



## 《记忆》136 期

## 目 录

### 【专 稿】

余汝信 赵紫阳与广东文革

### 【要有光】

胡 杰 晚上在窑洞里偷着吃（版画）

依 娃 逃荒的未婚女子

### 【评 论】

王海光 答客问：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

### 【札 记】

李嘉树 安徽首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建成记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六）——文学的雄心与内心的战斗

### 【访 谈】

张 彦 在中国遭到隐匿的历史——采访纪录片制片人胡杰

### 【述 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二）——看地的营生

徐米甘 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二）

### 【资 料】

不 平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1972 年 5 月 12 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给公安系统选调复员战士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发〔68〕59 号

### 【读者来信】

1. 许绍英提醒《记忆》注意学术规范
2. 胡泊纠错
3. 周元龄纠错
4. 张晓良谈《纪念白求恩》及陈仁德咏江青诗
5. 蒋健置疑
6. 安徽大学教师李嘉树征集安徽文革史料

### 【版权声明】

【专稿】

## 赵紫阳与广东文革

余汝信

### 一、亦步亦趋的 1966 年

1965年2月，四十五岁的赵紫阳，接替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陶铸，就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

翌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袭中国。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声称：“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等言词，振聋发聩，不能不引起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极大震动。

三天之后，5月19日，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上作了文化革命的动员讲话。会后，广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得不跟随着中央的部署，亦步亦趋地展开。

随着“彭、陆、罗、杨”先后倒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惟广东问题，尚在陶的关怀注目之下。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

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的消息同时由新华社公布。在赵紫阳的督促下，6月7日，广东省委决定：立即从省直各机关单位抽调干部900人，组成工作队，分赴各高等学校帮助和领导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思想领域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sup>1</sup>同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与中南局主管的《羊城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评秦牧的〈艺海拾贝〉》，批判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其斗争锋芒应集中指向那些党内党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sup>2</sup>后由于运动发展远超预期，大、中、小学实际上长期“停课闹革命”。

6月22日，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赵紫阳，请他研究大、中学校里的夺权问题。陶铸提醒省委，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要处于省委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学校里一哄而起的学生运动，一定要由工作组加以控制。他还特别指出，要慎防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敌人夺权。6月26日赵紫阳召集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了陶铸的指示。<sup>3</sup>赵紫阳还称，“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单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所谓被动状态，就是说，这个运动我们还未真正领导起来，运动的领导权还未真正抓到手，学生还不太相信我们；或者有些是工作队已初步取得了领导权，但很不巩固，还时刻有脱离领导的危险，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还差。我们跟不上去，他们就会离开工作队的领导。”<sup>4</sup>

<sup>1</sup>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05。

<sup>2</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5。

<sup>3</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

<sup>4</sup> 赵蔚：《赵紫阳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2月版，页131。

7月2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已被责令停职反省的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夫人）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队进驻电台领导运动。翌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中山医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和党委副书记刘志明两人的一切职务，改组学院党委，指他们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

7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重新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鉴于文化大革命战线太长，部分地区出现动乱，为了稳定局势，决定缩短战线，重点放在中等城市以上的文化、教育部门，已揪出了“牛鬼蛇神”的单位，应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转入专案处理。并规定，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许搞自发夺权，力求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7月15日，在北京的陶铸针对当时出现的乱斗乱搜乱抄家的严重状况，指示省委：“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动信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还指示“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sup>1</sup>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会议，讨论运动情况。会议指出，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从而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7月21日，赵紫阳在广州高等院校工作队队长会议上称，“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sup>2</sup>

北京的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7月下旬，在南方半年多后返京的毛泽东，对北京地区文革表示极不满意，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李雪峰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称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露面，以此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7月30日，正在北京准备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赵紫阳及准备出席全会的

<sup>1</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207。

<sup>2</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本，页28-30。

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区梦觉，得知毛泽东已在工作组问题上明确表了态，遂匆匆写信给省委，对撤退工作组作了紧急布置：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太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隔了一天，8月1日晚，赵紫阳又打电话给广东省委，指示尽快解决工作组问题。因为北京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广东也应这样做。他说：“工作队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个系搞好了撤一个系，一校搞好了撤一个校，陆续撤。不用等我回来一起撤。”他还解释说：“所谓搞好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能够领导运动了。”8月6日，省委遵照赵紫阳“工作队马上撤出”的指示，匆忙作出了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sup>1</sup>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着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很快就要烧到各地各级党委头上。陶铸在这次全会上虽然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惟中南各省、区党委却不能因此有更多的受惠，从而逃脱受冲击的命运。

8月7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毛的这段文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改变了全会原有的议题和日程。敏锐的赵紫阳闻风而动，通过电话亦口述了一份题为“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由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于8月8日贴到省委办公大楼入口处，表示“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贴自己的大字报，揭露、批判自己的错误。翌日，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也联名写出一张内容大体相同的大字报，以表示欢迎群众揭发、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错误。<sup>2</sup>

8月17日晚，从北京回到广州的赵紫阳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称：“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

<sup>1</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7-208。

<sup>2</sup> 参见赵蔚：《赵紫阳传》，页138。

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sup>1</sup>

8月31日，清华大学南下串连的两名学生给广东省委贴出一张与毛泽东的“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该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其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曾讲过，广东省委派出的工作队的问题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该大字报则说，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相互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赵紫阳曾提出，选举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要由各派代表组成。大字报则认为，委员会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各派都参加的议会制。最后，大字报的作者断言，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sup>2</sup>

9月3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与会者有四千多人。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分别代表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和广州市委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sup>3</sup>在此前后，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反组织蜂起。

9月15日，一名广东省委的普通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针对赵紫阳的大字报，揭发赵紫阳出身地主，父亲于土改时被处死，要求将此事搞清楚（赵父于1947年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在家乡发病去世，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sup>4</sup>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的批语则称，“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下达后，因所谓“黑材料”问题，广东省委陷入更深层次的被动挨打状态。

11月4日，赵紫阳被迫代表省委作检讨（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党委都作了检讨）。赵不得不承认省委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省委在运动中

<sup>1</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37。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42。

<sup>3</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9。

<sup>4</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43。

“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赵也辩解道：省委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赵紫阳代表省委检讨后，广州和外地来的一部分红卫兵并不满意，认为检讨是假的，是阴谋，是为了蒙蔽群众。<sup>1</sup>

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10月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月，他们就“黑材料”问题，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要求赵紫阳等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5日，赵紫阳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陶铸在11月6日以电话答复：“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sup>2</sup>

11月16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内称，“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此前，11月9日，已有学生冲击了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一部分材料，省委组织部档案被封。此后，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从下午3时至清晨6时，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围困赵紫阳长达15个小时，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赵紫阳在打给陶铸的电话中焦急地说：“现在广州情况越来越紧张，问题的焦点还是材料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少数派（全市约一千多人）激烈得很。”“因为材料问题，省委同少数派的关系闹得很僵，本来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是准备同少数派在一边的，但现在无法做到，反而越来越糟……平反问题，也与材料问题有互相联系，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自然紧张，我们每天的时间，自己无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sup>3</sup>

11月27、28两日，本地和外地的红卫兵，继续冲击省委，搜查省委的“黑材料”。28日，省委被省直联络总部一些人和华工红旗、中大八三一、珠影东方红、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地质东方红、哈军工和中南林学院等八个组织抢走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44-145。

<sup>2</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4。

<sup>3</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8-109。



文件、刊物 378 份，笔记本 23 本，包括有组织部记载干部调动方案的笔记本。12 月 3 日，赵紫阳以电话向陶铸报告：“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厉害……在学校，少数派与职工多数派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广州各大专学校的少数派联合行动，很容易冲突起来。”12 月 10 日，赵紫阳向陶铸汇报说，造反派的火力，“现在集中攻省委在十一中全会后和工作会议后，仍坚持反动路线，材料处理不下去，平反问题中央补充规定传达得晚，省委挑动群众排外，机关运动停下来等等。”12 月 11 日、14 日，部分群众组织连续两次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广东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赵紫阳被揪去大会接受“批判”。<sup>1</sup>

## 二、在夺权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 1967 年 1 月，陶铸最终被打倒以及发源于上海肆虐于全国的“一月风暴”，使已饱受造反派冲击蹂躏的广东省委，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陶铸的地位在 1966 年 12 月下旬已岌岌可危。1967 年 1 月 4 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称：“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未有异议。1 月 8 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就陶铸问题表了态，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1 月 5 日，陶铸被揪出的坏消息传到广州，赵紫阳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说：“陶铸被揪后，红卫兵小将对省委的看法将会根本改变，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今后省委书记处碰头的机会更少更困难了，希望大家独立作战，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同一天，在省委碰头会上，他还讲道：“看陶铸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广东省委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陶铸被揪，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我是重点人物，准备被打成黑帮。”<sup>2</sup>

1 月 7 日，省委发出一封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致省内各级党委、

<sup>1</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 109-111。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 151-152。

红卫兵组织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信，承认“省委过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造省委的反的人”，同时希望“同学坚决揭露和批判省委的严重错误”。<sup>1</sup>同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阑西被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经中央批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三十二个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前此，1月8日，毛泽东就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夺权说过，“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几天以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为明朗。1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的评论员文章，内称，“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翌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在开头即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广东的夺权，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sup>2</sup>

1月20日，中大红旗、红旗工人、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与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等本地群众组织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驻穗联络站在中山大学开会，商讨夺权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

<sup>1</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12。

<sup>2</sup> 以下夺权经过，主要参考了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48-156。

台和报刊的权。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赵紫阳参加了大会。会后，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根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拉到中山大学。当晚，赵等人被留住在中大。一些造反派问赵对夺权有什么感觉，赵说，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一种是夺权。

1月22日清晨六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把赵紫阳单独叫进另一房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了省革联《夺权通告》。

当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的《夺权通告》声称：“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长期以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下的省委，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阳奉阴违，欺上压下，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把广东省搞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为此，“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广东省委的一切权力归我们革命造反派所有，任何人不得有敌视，破坏的行为。”<sup>1</sup>

同日，省革联发出《通令》，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接管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接管后，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决定均须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过后方能生效。”<sup>2</sup>

学生念完《夺权通告》后，问赵紫阳有什么意见，并要他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学生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sup>3</sup>

赵紫阳表示，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夺权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你们夺权我支持。他当即给在省委值班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大意）

林李明看到赵的条子后，表示交印的事最好由省委做个决定，并要请示中共

<sup>1</sup>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sup>2</sup>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sup>3</sup> 赵蔚的《赵紫阳传》则称学生的这句话是在1月21日晚对赵说的。

中央办公厅。未待得到北京答复，林李明已被揪到中大，同时，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也到了中大。

林李明1967年2月3日和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讲述夺权经过时说，他向赵紫阳提议，最好告诉中央一下。然后，红卫兵一个个问他们同不同意交印，大家都同意交印，他也说了同意，但要报告中央一下。赵紫阳说，考虑到请示中央也不能马上答复，就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

当大家同意交印以后，由赵紫阳亲笔起草，在座的省委书记处成员共同签署了一份交印协议。协议称：“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赵紫阳还口头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交印协议”与林李明所称赵紫阳给他的条子的口径显然有很大区别。“交印协议”强调省委大印只是“冻结”，办公厅、省文革的印章只是“由造反派派人监印”，而并非直接将“三个印交给他们”这么简单。

参与了省委夺权全过程的中大八三一负责人黄意坚后来称：“广东省革联的夺权与全国都不同。是‘我听毛主席的话，你听我的话’。它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老周（指周恩来）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上海的夺权方法，老周是不能接受的。22日上午，那天我在八三一，老周办公室打电话来：你们的形式好。”黄意坚说：“老周是点了头的。”<sup>1</sup>

惟没有实行“三结合”的广东“一二二”夺权，中央最终并没有予以肯定。

1月22日下午，赵紫阳等被造反派“释放”。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起草中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各部委、各战线负责人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赵紫阳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1）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此错误长期以来觉悟得慢，认识得差，改正不够。（2）各

<sup>1</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6-157。

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3）我们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赵强调，夺权以后，要继续积极工作，否则就是对抗夺权。<sup>1</sup>

1月23日，省委发表由赵紫阳审阅、省革联监督小组通过并批准印发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

该书称，“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改正很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将更有利于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更有利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强调：“省委郑重表示；我们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所犯严重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后，一定要更加积极工作，决不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我们认为，任何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都是同革命对抗的犯罪行为，是决不允许的。”<sup>2</sup>

1月28日，省委机关三个由一般干部组成的战斗队，“勒令”赵紫阳和省委书记处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搬出省委东一楼，将东一楼让他们作总部。赵紫阳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本应支持，有些具体情况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因为省委书记处在东一楼集中办公是与省革联商定的。”“夺权是象征性的，当时我们在中山大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象征性夺权，由小将们监督，二是我们彻底靠边站。小将们选定了第一个方案。现在省委是在省革联监督下工作，既然还需要工作，那就还要有办公地点。”赵明确表态后，“勒令”也就不了了之。<sup>3</sup>

2月8日，省革联发动属下三十多个群众组织冲击广州军区领率机关大院，以示支持受到压制的军内造反派组织，提出“万炮齐轰广州军区党委”、“打倒黄永胜<sup>4</sup>，解放广州军区”等口号。省革联与已介入地方支左的广州军区关系迅速恶化。延至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

<sup>1</sup>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7。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56。

<sup>3</sup> 赵蔚：《赵紫阳传》，158-159。

<sup>4</sup>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广州军区表态后，2月23日，赵紫阳在省委大院贴出大字报，题为《对于“省革联”问题的声明》内称：“1月22日‘省革联’向省委夺权，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一，认为夺权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二，当时出面的是中山大学‘八·三一’和红旗公社，武汉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红卫兵，还有哈军工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我一向认为这些单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夺权，我认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三，对当时广州地区造反派的大联合，我是不清楚的。听说他们有很多单位参加。根据当时情况和我处的地位，不可能先问他们大联合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对夺权是否接受。四，在1月22日之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的一些重要社论和一些省的经验，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sup>1</sup>

同日，广州军区就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等问题，给中央军委等写了报告。次日，毛泽东就此报告写了一段批语给周恩来：“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sup>2</sup>、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sup>3</sup>毛泽东似对赵紫阳站出来参加三结合寄予一定期望，赵等随即到京。

2月27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sup>4</sup>、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批道：“同意这样做。”<sup>5</sup>周恩来表态之后，赵紫阳站出来短时间内已无可能。他也没有如某些省、区第一把手留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运气，很快就被令回到广州，继续接受批判。

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广东省的权力中心正式转移到广州军区。广东省委彻底瘫痪。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62。

<sup>2</sup> 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

<sup>3</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42。

<sup>4</sup> 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

<sup>5</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43。

4月中旬，周恩来为处理交易会事到广州，多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在4月18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谈及了广东“一二二”夺权和原广东省委等问题。周恩来称：

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说“省革联”和一·二二夺权是有极严重错误的。我们要指出，我们很坦率，现在要说清楚，二月底三月初，我们当时看到广东省的工作已瘫痪了一个月，急得很，觉得非要找赵紫阳，陈郁同志，还有林李明同志，寇庆延同志，还有区梦觉这些人不可（当然陈郁是已经到中南局了），军区同志也找了几位，主要是陈德同志，把他们找到了北京，黄永胜同志当时在北京。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就叫我们办了。那种夺权不能继续下去。虽然大方向对，实际上这个大方向对是抽象的，实践的结果证明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不能够这样面向前方（前边所说的两种情形，特别第一点所说的情况），不仅面临港澳，还有美帝、蒋帮、日本军国主义等敌人，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使革命领导权中断，所以一定要也只有建立军管。赵紫阳、区梦觉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是一种问题。小将们犯了严重的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把它弄清楚。到了北京，果然弄清楚了。在我们看，一·二二夺权前后，旧的省委以赵紫阳、区梦觉他们两人为代表，当然还有其他人，那次尹林平（到中山大学谈判交权）去了没有？去了嘛！签字有他嘛！中大同学可以证明。赵紫阳靠边站以后，还要尹林平召集书记处会议，是不是这样子？（中大同学答：是。）所以至少这三个人应该提出来吧，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他本来叫林平，是老红军，他是江西人，兴国佬，后来不知怎么转到南方留下转到地方工作，然后七转八转，到抗日战争就转到东江纵队），前省委以他们为首，在我们看来那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是利用了这次夺权。

.....

一·二二夺权当时就犯了错误了，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

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援，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愿意公开来指责，因为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所以对夺权的方向我们都没回答。……赵紫阳和旧省委利用了这个错误，是他的责任。他很善于说话，到北京以后，我们批评这个让权不对，没有去强调夺权的问题。强调让权不对，你是省委书记，中央还没有免你的职，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在中山大学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谈判你就签字，就让了印了呢？革命的小将要夺印还有根据，咱们有出《夺印》的戏，掌权掌印嘛！那是戏里形象化的名词。真正的彻底的夺权，那个印有什么要头。所以后来夺了印的那些革命派，印拿到身上也没有办法，后来把印交给军区，代为保管了。

……

所以，应该说赵紫阳他们懂得，这不能够怪学生。因此我们说他让位不对。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比如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就是斗嘛！你不交他也没有办法，而且你可以说要请示中央嘛，就解决了。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旧省委的领导犯了很多的反动路线的错误，当时还说到反动路线。赵紫阳在回答的时候，他就集中到让位让印这个问题上，他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犯罪行为。这句话他说了以后，我当时没有注意，回来一想，这个不妥。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至于地委、各个企业、部门里头被人家把印抢去的更多得很。如果凡是把印交给人家就叫犯了反革命的罪，这个就不胜其数了。所以，在他走以前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件事可不能叫反革命罪，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让位让印这一件事，就叫反革命现行犯，这个案办起来也没有多大办头嘛！其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通通可以不管了？当时我没有觉察，后来一想，他这句话有点很调皮哩！所以我同时打一个电



话告诉黄永胜同志。那晓得他回来以后，就把我说的让权不是反革命罪这句话扩而大之，说他没有犯反革命罪。这样他就躲开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都可以躲开了。现在看起来，他很调皮咧，所以，你们问我到底说了没有，我是说了。我是指的那一件事情不能说叫反革命罪，因为这类事情多得很哪，如果这一件事就说是反革命，实际上是避重就轻了，是不是？这件事，我应该把它说清楚。

.....

在这个地方，要严防前省委的复辟的逆流。譬如说，刚才说的这些人，特别是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安知他们不利用另外一个机会搞复辟，当然那也不一定同一个对象，他可以找另外一些左派，另外一个对象，你们要警惕，严防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的复辟的逆流。<sup>1</sup>

赵紫阳得知周恩来讲完话之后，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信，说他没有讲过类似“反革命犯罪行为”这样的话，可能是总理记错了，请黄司令员帮助回忆一下。以赵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寄希望黄会帮他证明，只是想申明一下而已。几天后，黄的秘书来电话，说黄让他告诉赵，黄的印象与你（赵）是一致的。黄为人正直，此举令赵颇为感动。<sup>2</sup>

今天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对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的指责，实在很难令人信服。（1）正如赵紫阳在2月23日声明中所申述，夺权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周恩来自己也说“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没有理由公开抗拒，只得承认“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2）周恩来既然说“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又说“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你怎么样”，这段话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为避免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赵紫阳等人只能出此下策。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般以死抗争的，毕竟是唯一的例外，但未见得周恩来是要求各省、市、区第一把手以卫恒

<sup>1</sup> 《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页17-22。

<sup>2</sup>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为榜样吧？！（3）周恩来指责赵紫阳“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有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事实上当时并非没有请示，而是中央（中央办公厅）没有答复。此外，交印时，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4）赵称，中央“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此为实情。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况且，所谓交印，其实只是监督使用，“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赵还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黄意坚更说，省革联“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最好的处置办法。

### 三、被“监护”的日子

1967年5月5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下达了“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并令黄永胜将执行情况上报。三天之后，执行监护任务的广州警备区向军区提交了题为《对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实行监护斗争的措施》的报告。

报告称：“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三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sup>1</sup>

实行军方所执行的“监护”之后，赵紫阳等人虽未“定性”，但已失去人身自由。惟比起在造反派手中无休止的批斗，他们的人身安全却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

生活上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安定。批斗已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节制，有军队监护人员在场，起码可以做到“掌握斗争时间”，“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

关于赵紫阳等人的态度，警司的报告称：“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到警司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了话。赵、区反映较好。他们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生活学习都有较好的保证’，也愿意考虑自己的问题。”惟“对赵紫阳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紫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紫阳’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sup>1</sup>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赵紫阳仍对原则有所坚持。

自此，赵紫阳在军队监护、禁锢的氛围中度过了整整三年的光阴。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除军队干部及群众代表外，原中南局陈郁（第三书记）、王首道（书记处书记）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原广东省委常委林李明、罗天、赵卓云、寇庆延四人结合为省革委常委。成立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黄永胜、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等在大会上的讲话均点了陶铸、赵紫阳的名，称之为“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唯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广东省革委会成立而发表的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仅以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指代赵紫阳，稍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名。

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1968年2月3日，赵紫阳在“专案组”的要求之下，写了一份一万余字的《我的检查》。在检查中，赵紫阳只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刘邓陶的路线，并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赵紫阳承认自己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狠抓阶级斗争，只注重生产而忽视革命等等。在与陶铸的关系上，他承认，由于陶铸对自己长期重用和支持，自己对陶有好的印象，长期形成“盲从”，并在文革中接受陶的指示，成为陶在广东的代理人。<sup>2</sup>

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时，赵紫阳写道：“我之所以犯这么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的立场和世界观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最最根本的问题，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166。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

还在于我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有问题。我没有真正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努力理解’。这是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不忠。我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学习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至今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还是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当解决问题时，对于毛主席的教导，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还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去办。”<sup>1</sup>

赵紫阳接着检查道：“我过去对待许多重大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首先去对照一下，看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着重地去考虑根本的、长远的、政治方面的后果，而是多从眼前的效果、特别是眼前经济方面的效果出发去考虑，依靠自己的‘感想’自作聪明地去想一些小方法，打一些小主意。结果就不能不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sup>2</sup>

赵紫阳在检查中写道：“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更严重的是，我有时不是努力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实质，按毛主席本来的意思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带着自己的倾向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话，片面孤立地加以强调，这样形式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更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忠诚。”<sup>3</sup>

当时的赵紫阳，是怀着某种负疚的心情来作检查的。凡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老干部，大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阶段。赵紫阳在自己的检查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点。赵紫阳的检查，并不能使他免于被批判。相反，他的检查变成了射向他本人的箭靶。

1968年4月14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声称“特别值得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警惕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与‘二月逆流’翻案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171。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

<sup>3</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172。

妖风北呼南应，于今年二月抛出了他的所谓《我的检查》的万言翻案书，向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你不把他彻底批倒批臭，打翻在地，他就要反扑。”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掀起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迎头痛击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翻案的妖风，把混进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两面派统统揪出来，批倒批臭，彻底粉碎他们的翻案复辟阴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sup>1</sup>

于是，一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骤然而至。赵紫阳以往的言论被精心收集、断章取义，编成所谓的《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赵紫阳的反动言论摘编》，对赵紫阳的指责，可以说，是极端的牵强附会。例如，赵紫阳于1966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曾对一位领导干部半开玩笑地说：“在天子脚下嘛，京官难做。”这被说成是“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赵紫阳于1965年8月在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自觉自愿，不能强制，奉命学习，那是徒劳无功的。”这被说成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赵紫阳于1959年1月说：“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焦点。”这又被斥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物质第一”。赵紫阳讲“产量责任制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调动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最好措施，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新发展，可以把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被指责为“鼓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推行“三自一包”。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这被斥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sup>2</sup>

在广州“工人纠察队”组织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上，有一个干部上台揭发了一件所谓的“赵紫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例，即1962年秋，当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时，一位干部在下面讲了一句“刚刚好了一点，又来了”，当场即有“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站起来，指出这是反对毛主席的行为，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只说这是认识问题，没有追究。

<sup>1</sup> 《南方日报》，1968年4月15日。

<sup>2</sup>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2-173。

这就构成了赵紫阳的“反动问题”了。<sup>1</sup>

这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从1968年4月开始，搞到五六月份，即成为强弩之末，揭不出什么“爆炸性”的问题，只好草草收场。

1969年4月20日，九大召开期间，负责赵紫阳专案的广东省军区第五办公室，向广东省革委会报送了《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紫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开头便称：

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明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勾结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sup>2</sup>

该报告在历数了所谓赵紫阳破坏文化大革命，死保陶铸等“罪行”之后，又专门讲到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1967年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东四千万革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奋起向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赵紫阳看到他疯狂镇压、笼络利诱革命群众的种种阴谋已经遭到破产，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全面崩溃，特别是看到他的主子，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被揪了出来，更加惶恐万状，眼看‘权’保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失败，出于其反革命的‘寸权必争’的反动本性，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于1月22日玩弄一个假让权真保权的阴谋。结果，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方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赵紫阳反革命修正主义真正目的一次大暴露，是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反扑。”<sup>3</sup>

省革委会将《审查报告》报到北京后，一直未得到中央批准。赵紫阳的问题

<sup>1</sup>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3。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sup>3</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被“挂”了起来，没有结论。

后来，赵紫阳曾与家人谈起文革旧事，说他最感绝望的阶段，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他当时认为，随后将会轮到像他这样的各省头号走资派，相继被开除党籍。他说：“我当时曾想过，如果通知我参加省党代会（当时以为刘出席了全会），我是否还能走得动？想的结果是，还是走得动的。”<sup>1</sup>

## 四、重新工作的五年

赵紫阳没有被开除党籍。且所幸的是，1970年6月间，赵紫阳的政治生命迎来了一线曙光。在失却自由整整三年之后，赵紫阳被解除监护，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此一处置办法，标志着赵的问题起码已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了。

这一年的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境内的地方军工企业——981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同行的还有夫人梁伯琪和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在车间的欢迎会上，赵紫阳恳切地对工人们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sup>2</sup>

赵紫阳以为，在下放劳动一段时间后，中央可能会安排他在湖南当地工作。譬如，到一个县里，担任抓农业的副手，把一个县的农业搞好，已心满意足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转折。1971年4月底的一个深夜，赵紫阳突然被通知连夜乘汽车到长沙。行车一夜，深思一路，不知祸福。最后认定不致太坏，否则会有人押送。到长沙，广东省革委会一军人处长已在等候，即陪同换乘火车赴京，问何事，答一概不知。火车一进北京站，直接被拉到人民大会堂去见周恩来。甫一见面，赵诚惶诚恐地对周说：“我过去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深，……”周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一致同意，让你到内蒙工作，马上走，内蒙的党代会马上就要召开了。”赵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周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文革以后的全套中央文件。”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到北京饭店住下，赵一宿未眠。<sup>3</sup>

1971年5月11日，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党的领导小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补台”工作的请示报告》，同意尤太忠任自治区革

<sup>1</sup>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sup>2</sup> 中国·娄底网站，[www.huloudi.gov.cn/Item/61594.aspx](http://www.huloudi.gov.cn/Item/61594.aspx)

<sup>3</sup>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委会主任，增补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两天后，内蒙古“三大”在呼和浩特召开，尤太忠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样，赵紫阳成为了内蒙第五把手，分工主管全区的农牧业生产。

与赵紫阳同时被毛泽东“解放”的文革前夕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还有两位：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到福建任省委书记；张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未“官复原职”，比起那些仍被关押审查的原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大批干部，三人已属相当幸运！

1972年3月，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后，经毛泽东同意，广东第一把手刘兴元调四川主持工作；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调赵紫阳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此时，排在赵前面的省委书记，还有孔石泉（广州军区第二政委）、陈郁、王首道。与在内蒙的地位相同，赵紫阳仍为第五把手。

3月24日，赵紫阳出席回到广东后的首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孔石泉在会上说：“丁盛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好班长；赵紫阳同志回省里工作，我们一致表示热烈欢迎。赵紫阳同志在广东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经验很丰富，我们要向他学习。”王首道也说：“赵紫阳同志回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必要的。”<sup>1</sup>

在常委会上赵紫阳也讲了话。他说：“向同志们交心。我是犯了大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都犯了错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到广东来工作，对我是宽大，是信任，也是寄予希望，给我在哪里犯错误就在哪里改正的机会。”“我身体还好，有积极性，过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嗅觉不灵、模糊。今后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鼓足干劲，振作精神，以功补过，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sup>2</sup>

随后，在省委分工中，赵紫阳分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7月4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农林科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先说了些套话：“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林业生产和科研领域中，要清除他的流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把批林整风和各个领域里的路线问题结合起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90-191。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91。



来，同三个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各个领域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批得深。”<sup>1</sup>

接下来，赵紫阳着重讲到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目前我们广东，总的来讲粮食还是偏紧，群众的口粮还是紧张，市场也比较紧张，归根结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跟不上去。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和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一些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有那样迫切的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还应当进一步的缩短，这样我们才可以挤出资金和材料支援农业，我看这是考虑农、轻、重关系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还讲到农业和副业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单纯搞粮食不搞经济作物，不搞林、牧、副、渔，不搞其他。其实，只搞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就是上去了也是不能够巩固的。这是辩证的，不能有片面性。在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这一点。另外也有实际问题，粮食如果绷得很紧，搞得群众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再讲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所以粮食如果搞得很紧张，农民担心口粮问题，他就没有心情去搞多种经营。”<sup>2</sup>

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论述秋收分配问题。文章写道：“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分配政策，是搞好秋收（年终）分配工作的保证。”

“要坚持贯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要处理好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要认真搞好粮食分配；要进一步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切实兑现分配。”<sup>3</sup>当时，对于农村的分配问题，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1973年1月26日，广东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继续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允许社会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政策，认真加强经营管理工作，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收益分配等自主权。<sup>4</sup>

3月18日至31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会议结束时赵紫阳讲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92。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93。

<sup>3</sup> 《南方日报》，1972年11月11日。

<sup>4</sup>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50。

道：“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和谬论，教育干部、群众坚持‘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整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批判‘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也要批判‘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防止在克服一种倾向的同时，掩盖着另一种倾向。’<sup>1</sup>这无非还是一些套话。作为省委书记，在公开讲话中，不能不使用当时的通行语言，情有可原。

8月，赵紫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

12月，中共中央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任地方党政职务。翌年4月4日，中央决定：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赵又一次成为广东的第一把手（而且是党政第一把手）。从1967年5月被监护到今天，赵紫阳离开这一岗位整整七年。

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训，重新成为广东省第一把手前后，赵紫阳在他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之内，对某些人和事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宽容的处理。

原广州旗派头头之一、“华工红旗”负责人高翔，1968年2月曾作为“广州三司”的代表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并担任了常委职务。当年8月，被责令回校接受批判审查，翌年被免去省革委会常委一职，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翁源县工作。1973年，任县革委工交办副主任。

1974年3月22日，赵紫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广州找高翔谈了一次话。<sup>2</sup>

一开始，赵紫阳向孔石泉介绍高说：“他们在广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个‘北京来信事件’。那时还没有‘八三一’他们。以后，对北京来的人在广州写的那篇文章（指《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较强……”高翔想不到赵紫阳会对他做出如此善意的评价。这个开场白就像在介绍一个老朋友给别人认识一样，语气中还略带一点赏识之意。

<sup>1</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194。

<sup>2</sup> 关于赵与高翔谈话及交往情况，资料来自高翔：《文革往事——追忆我人生轨迹中的赵紫阳》（未刊稿）。

当高翔谈到广东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赵紫阳说：“七千人问题，我总有个考虑，你们怎么能调查到这个数字，我不是说七千人这个数字不准，我也没有调查。只是感到你们没有条件进行这个调查。”孔石泉说：“非正常死亡还不止这个数字。”高说：“我的数字是各地参加旗派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当地旗派组织报的，不是全部人员。”赵紫阳说：“这些被杀的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的？是一派杀了一派还是怎样？”孔石泉说：“当时的形势很乱，有个历史条件，其中有坏人挑动。”高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只有一派有力量杀人。”赵紫阳说：“我了解潮阳县杀了几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县地区就搞不清楚杀的主要是什么人，那个地区杀人最多的。”这时高感到赵紫阳是以平等的姿态在和他讨论问题，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在高翔谈到干部问题时，赵紫阳说：“干部问题还有这么个情况，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整个干部队伍中，大部分的骨干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看不惯，但这些干部一贯表现很好。有些干部虽然支持了旗派，但一贯以来表现不一定很好。广州的干部中，一贯较好的，支持旗派的较少，这是个基本情况，能不能笼统地说支持旗派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呢？如湛江地区又不一样，那里的老干部支持旗派的较多，站出来的也较多，那里东风派很有意见。”高说：“干部问题主要存在的是对同一类型的干部，却有不同的两种态度。反对过黄（永胜）的就抓得紧一些，小事变大，大事变性。反过来又不一样。”赵紫阳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认为是存在这种情况的。但支持旗派的干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贯表现好，运动中又支持旗派的；一种是一贯表现不好，有不满情绪，运动中支持旗派的，不能说明他们的路线觉悟高。”孔石泉说：“当前干部确有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新生力量看不惯的思想。这就要做长期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有这种人。”高说：“一般情况下，这是认识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反映的是路线问题。在当前来说，这种思想妨碍了政策落实，正是这次运动要冲击的。不完全是慢慢来，长期教育的问题。广州的问题是对那些一贯表现好，文化大革命支持了旗派，路线觉悟较高的干部的看法，还不如一贯表现一般而支持了东风派的干部。”在干部问题上，赵紫阳先是引导高看干部不能只看他是否支持旗派，还要看他的一贯表现。针对高的这段话，他又进一步分析说：“支持旗派的干部分三种，一种是一贯好，开始支持旗派，路线觉悟高，后来比较清醒；二是一贯好，

支持旗派，但后期跟着旗派犯了错误的干部，对他们的错误看得过于重一点；三是一贯不很好，支持旗派的干部。”他层层深入的分析令高信服。

谈到落实政策的问题时，赵紫阳提出说：“落实政策不够全面彻底，和林彪、黄永胜路线的流毒问题是否有一条界线，是我们的工作做不到家还是林黄流毒的问题。”高翔说：“政策的落实是现象，阻碍政策全面落实的根源是林黄路线流毒的影响。”赵紫阳接着说：“‘一打三反’、清查‘516’都是中央有指示、有部署搞的，与黄永胜在广州的路线之间要有一个区别，恐怕不能认为是黄的路线，这提法上要慎重考虑。”孔石泉说：“清查‘516’在北京总理、康老、江青等同志都是讲了话的，我们是按照中央的。”高翔说：“同样是中央传达下来的精神和部署，但各个省贯彻起来都有差异，如卜占亚在湖南搞‘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就有路线错误的问题。”赵紫阳说：“有七八个省份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省都点出了上贼船的人，广州没有点出这些问题来。”高翔说：“中央也没有表态说广州没有问题。中央文件有指出黄永胜‘对反对过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等’，他在广东的具体表现是否存在呢？他的清查对象是对着一派革命群众组织，而这个清查方向一直到‘913’事件以后还不变。”赵紫阳说：“‘一打三反’、清查‘516’能不能认为是黄永胜搞的还是值得考虑。”孔石泉说：“有些具体的情况你们不清楚，中央是有精神的。”高翔说：“省委对整个情况也未必很清楚，可能有人背着你们两位干一些事情也不一定。在发动群众揭开盖子之前，我们都不必先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是倾向于广东会揭发出一些问题来的。”赵紫阳说：“我倒倾向于广州再揭也揭不出太大的问题。对刘兴元、丁盛中央讲了话，我是相信中央的，今天还是这个看法。”孔石泉说：“是要发动群众，对黄永胜问题，另立中央问题等群众有怀疑，有看法应该发动大家揭发，揭发以后还没有什么问题，这怀疑就解决了。”

谈到揭盖子的问题时，赵紫阳说：“考虑解决揭盖子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是重新挑起两大派矛盾。68年时有个历史条件，那时毛主席对几个学生领袖的讲话，在北京开串联会的问题中央有表了态，正是旗派犯错误的时候解决派与派的问题条件较有利。这次最好避免像四川那样翻来翻去的局面。这两大派的问题是当前比较难解决的。既要揭发矛盾，解决矛盾，又不希望走太大的弯路。老实说，我是有点留恋目前比较平稳正常的形势的，有点怕乱了。”

这次谈话，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还近乎在辩论，但高翔感到了赵紫阳的坦率和诚恳，平添了对他的信任。

最后，赵紫阳还对高翔说：“我们还准备找你们这边几个人座谈，省委的同志也多来些。多听几方面的意见都是有好处的。”

3月26、27日赵紫阳、孔石泉、王首道等10位省委领导，两次与刘继发、丘学科、周焱等10位旗派的代表开座谈会。

以后，孔石泉调回军区，赵紫阳和王首道、林李明、焦林义、寇庆延等还多次找群众组织的代表开座谈会。

4月22日，省委二秘通知高翔晚上7：30到赵紫阳办公室开会。高去时，见到只有赵紫阳一个人。这次他和高谈到深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赵详细地询问高对一些干部以及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看法；（2）赵提出为了发动群众又防止两大派产生矛盾，打算由旗派的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孙亦武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领导运动；（3）对广州问题严重性的估计，赵强调说：“对广州的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央对广州的问题是有处理的，残余势力总不能比原来的更严重吧。”最后，赵紫阳谈到恢复广东省革委常委的问题，问高有什么打算。高的回应是：（1）我是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省革委的，我自然要为他们解决问题。广东的遗留问题很多，希望省委认真落实政策。（2）我愿意协助省委维护广东的安定局面。我和一些东风派负责人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可以做联合两派的工作。

高翔说：“赵紫阳在广州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与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开座谈会，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既听取各方意见，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做法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1974年9月，高翔被安排到广东省第二工业局（军工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

1974年11月初，广州的李正天等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市内北京路口先后贴出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大字报名为批林彪，实质批江青，并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出了与官方口径不同的独特见解，一时引起哄动。广东省委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压力，于12月初印发了署名“宣集文”的

批判“李一哲”长篇论文，下发各单位。当月，广州市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全文印发“一张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和长篇按语，并与一些批判发言一道汇集成册，分发群众，人手一册，以供批判（其实无形中也扩大了“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

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有关方面对李正天等人采取了让其讲话、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等较为宽松的政策，召开了一百多场让其讲话的“大辩论”大会。当时流传一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有谁能把他驳倒。”

李正天后来称许道：“在四害横行的当时，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明知我们是反对江张姚的，他既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也没把我们投进监狱，相反，他对批判会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保护了我们的公民权利，这在当时是有胆识、有魄力的。”<sup>1</sup>李正天所说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的就是赵紫阳。

1974年，广东全省夏粮丰收，征购入库比1973年同期增长28%。全省三千多亩早稻大面积丰收，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一成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在当时各省的政绩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赵紫阳卓有成效的内行领导关系甚大。1975年，广东的农业生产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早稻丰收，全省三千多万亩早稻，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保持了1974年大丰收时的水平，改变了历史上大雨大减产的状况。赵紫阳在这场抗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庸赘言的。<sup>2</sup>

赵紫阳在广东取得的成绩，受到当时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重视。1975年10月，邓小平对赵紫阳、韦国清说：你们俩换一个地方，紫阳到四川，国清到广东。邓特别叮嘱赵：四川搞成这个样子！希望你能三年改变面貌！<sup>3</sup>赵随即到成都，就任中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不负重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已使四川的面貌基本改观。

2012年4月

<sup>1</sup> 李正天：《在“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6日，载《李一哲事件》，香港：中国焦点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页309—310。

<sup>2</sup> 赵蔚：《赵紫阳传》，页203、205。

<sup>3</sup>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要有光】

## 晚上在窑洞里偷着吃

胡杰版画



插图六：有粮食也不敢吃，只有等到深更半夜，在窑洞里偷偷的做着吃，吃是一种罪。在村村家家饿死人的时候，许多仓库里堆满了粮食、洋芋，都腐烂了。



【要有光】

## 逃荒的未婚女子

依 娃

受访人：周玉英，女，72岁，陕西省周至县尚村疙瘩头村人。逃荒前为甘肃省陇西县永基乡人。

时间：2013年9月4日；录音长度：23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周至县尚村疙瘩头村周玉英家。

大饥荒饿亡者：周玉英的伯母，女，年纪不详，甘肃省陇西县永基乡人。饿亡。周玉英伯伯的孩子，男，四五岁，甘肃省陇西县永基乡人。饿亡。

前记：来到周至尚村，村子很大，有几百户人家，休息的时候，我独自在村里转，打问三五个围住打麻将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六零年从甘肃来的人？”年青人指着前面：“到哪里问去。”我看见一个有些年纪的老人，又问了一遍，他说：“隔壁就有一个，你去问。”当时周玉英正看人们打麻将，说：“跟我来。”我就知道，她有故事。

依：姨，你今年多大了？

周：我七十二岁，来的时候也就是十九岁。

依：姨，你老家在甘肃哪里？

周：陇西，我们距离县城还远，五十多里路。我们距离武山近，那阵子是陇西、武山、甘谷合成了一个县。我们那地方叫个永基乡。

依：那时候你们家的成分是什么？

周：咱成分不好。不是成分，咱怎么来这里？咱是富农成分。

依：你们怎么能“评上”富农？家里富到啥程度了？

周：咱那个山区地方，一个大队三个村子，看比别人强一点，地多一点，就选择了咱一家子，就成了富农了嘛。

依：吃食堂你吃过没有？



周：吃了！不叫自己家做饭，把粮食、锅灶、柴火都收到一块，吃大锅饭，在我家里搭了一个大灶，吃了有半年。最后没有了，散伙了。把人饿的，稀饭都吃不上了。

依：没有吃的时候，你们吃什么？

周：我家里有吃的，偷着吃，晚上偷着吃。咱那里是山区，干燥，都有地窖，把粮食藏起来。有些让人挖出来了，拿走了，也有他找不到的地方。他想他的办法，咱想咱的办法嘛。

依：不让冒烟吗？

周：不让冒烟，咱家在边上，靠着山，有一个窑，深得很，按了一个小磨子。家里放着粮食不得吃，到晚上偷着磨，半夜起来推磨子，有麦子有玉米，那时候，我们家还能吃上麦。妈个×，自己有也不能吃。饿上一顿，吃饱一顿，多亏了那个山，他看不见。前面他们能看见，后院那个牛圈深得很，磨子就在那窑里面，天不黑人不进去。做饭也是窑里面做，有喝茶的那个炉子，前面不冒烟火。我们有铜锅，我们全家就钻在窑里面吃。

依：你们什么时候藏下的粮食？

周：是我大（注：父亲）以前慢慢藏下的，老人遇过的事情多，藏下粮食，遇到不好的年景了能救人的命。咱那个地下，藏的粮食多得很，就是不敢吃。他们来搜过，没有搜出来。

依：你看村里人饿死了吗？

周：那个，饿死的人多得很。我们家里偷偷吃着哩，村里人就饿得不像样子了。有些人是饿死了，没有吃的。有些人是有粮食，又没有办法吃，不敢吃，饿死了。还有些人粮食多得很，就是没有办法吃。有些人不让在自己屋里住，撵出来，你粮食藏起来就拿不上，有粮食还饿死了。我们家是晚上偷着吃，吃了不敢出去说。我大了，不会乱说话，我兄弟、妹子让吃饱，不准娃出门。那阵，就是你出门不说，吃饱的娃和受饿的娃看上去就不一样。吃饱的娃还玩耍哩，有些娃在墙角就倒下了，还有路上，就有走着就倒下起不来的人。你从村子走出去，那路上倒下的人就多得很，大路上、小路上多得很。都是附近的人，谁看见了也不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敢给吃上一口，不敢。我舅舅家住的离我们村子不远，人家晚上还有寻夜的人哩。弄一点面，想给我舅舅送去，看外面有寻夜的人，

我们就不敢去。就一直看一直看，到半夜了，寻夜的人都睡觉去了。我们自己吃了，我大就背上些面给我舅家去，让那一家子人吃上。那时候，背上几十斤面出门危险得很，让人看见就把你杀了，抢面哩。但是我大说：“多危险的事情都得去，都要把这个艰难度过哩。”每过几天，我大就偷偷给我舅送点粮食，就那么熬日子，度生活哩。我们距离近，就那么熬着过。

依：你们村里饿死的人多吗？

周：多嘛，我有个伯，有两个娃。娃来我家，我妈就偷着给吃，吃了饭，看看外面没有人，赶紧赶出门去，不敢让人看见了。就那么操心，我伯伯自己的粮食只能半夜偷偷在窑洞里吃。他家的两个人都饿死了。他婆娘饿死了，一个娃饿死了，就这还偷着吃哩。一般人我们不敢给，我伯的娃，去送点粮食我们也不敢去。人家娃来了，就偷偷给娃吃上些，就害怕娃出门说，咱自己也没有吃的了。娃出去一说：“人家屋里有馍哩”，就麻烦大了。我村子饿死的人多得很，多得很。我八姑比我大一岁，我九姑比我小一岁，加上我家里就三个大姑娘，我八姑六零年就结婚了。人家说让我九姑出去，我大说：“不出去，你婆跟前就这么一个小女孩。”我说：“让我出去，别的姊妹们都小得很，我出去。”我说我年纪大一点，能知道家的情况，还能再回来嘛。

依：这是哪一年？

周：这是六零年，最艰难的时候。我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哭，那是没有办法了。咱就朝外面走。出门逃荒的人多得很。说个好听的话，我的那个家庭，不出来也能成，咱那个成分把人逼迫的，压力大得很。不出门就不行，将来还有娃哩，娃上学家庭成分就必须写上。就逼我出门。如果不是那个原因，不是说生活紧张到啥程度了。我不出门不行，成天开会说：“贫下中农的女孩子都饿死了，都出门去了。”就成天把咱斗哩，那个话说得难听得很，我就受不了。我村里刚来了一个媳妇，人暴躁，是个团员，咱村子小，和我一样大的几个女孩，家里穷得很。出门都没有衣服穿没有裤子穿，我们就穿得好些。她对我说：“把你培养个团员。”我说：“咱成分不好。”她说：“没有事。”最后一报上去，等了一年，不行，没有批下来。我就受不了，成天叫人开会哩，听那个言语就听不下去。咱就受不了，就跑了。

依：你出来是自己跑？还是别人领来的？

周：我和我兄弟一起跑出来的。我那阵有十八了，我兄弟正上初中，还正念书着哩。那时候念书迟，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跑了。

依：你们出来，村里让出来吗？

周：我们没有经过村里干部同意，出门搭车也不好搭，出门流动人口就让人家收留了。我们坐车的时候还没有挡，一路就顺利过来了。

依：你识字吗？怎么知道要到陕西来？

周：我不认识字，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大说：“人家都逃难哩，往陕西跑哩，说陕西有吃的。你们去陕西去。”我们不是没有吃的，是不敢吃。村里人都饿死那么多了，你家人吃得胖呼呼的不行。对咱家庭就有影响，人家就有看法，我说我就出去算了。我和我兄弟坐火车坐到兴平，从兴平过了渭河，才过来。

依：你怎么落户到这里？

周：我刚下了车，就是天亮就过了河，就和要饭一样，我准备到山里去。有一个村子来的人在山里面，我要找她去哩。到这个村口，有个老婆子把我挡住，不让我走，看我可怜，就让我到她家歇息歇息。我想出了门了，落在那里算那哩。这个老婆子就是我后来的婆婆。我哪里都没有去过，就算落脚到人家家里了。再没有胡串了。

依：有一阵让甘肃的女人回去，有没有让你回去？

周：那一年，往甘肃送人哩，我的大娃都半岁了，我不回去，躲避开了。我回去也不行，有娃了。我的娃属龙的，都五十二了。我四个儿子哩。

后记：我们谈话的时候，周玉英的儿子周红福安静的坐在一边听。他四十出头，他说：“对我妈的这段历史，我还不清楚，也是第一次听。”等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回来了，夫妻坐下来，默默的吃饭，稀饭和馍，我拍下了这个平静的、岁月暗流的画面。在那个年月，吃就是一种罪；吃，要半夜偷吃。■

## 【评论】

## 答客问：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

王海光

拙文《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在《记忆》133期发表后，得到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确实是让笔者非常高兴的事情。在上期登载了越人、汪春劼、张晓良三位先生来信。为了表达对读者意见的敬意和尊重，我就有关问题做一回应。顺序是先简后繁，先易后难。

首先感谢张晓良先生的指谬，所指确实是拙文修改时的文字疏漏。在文章修改时，按照学术规范要求，我在给当事人化了名。尽管已审阅了数遍，最后还是有些差池。对张先生阅读文章的仔细和认真，我是心存敬意和感谢的。好读者是作者的好朋友。

汪春劼先生对拙文写作的评价，拿食材与做工打比喻，形象而贴切。我自己认为，做工上是还可以更精致些，有些细微处还可以再深度发掘一下。时代的常情常理都是在这些细微处体现出来的，再深入发掘，故事还能讲的更加生动。至于对案主及家人做口述采访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当初，我在拿到档案后也曾考虑过，是先梳理故事后做口述，还是先做口述后梳理故事。最后决定还是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先梳理出故事，而后有条件再做口述。汪先生的建议，可以是另一个关于“黑五类”生存状态的故事主题了，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口述史题目。随便再讲一下口述史问题。我与许多朋友都讨论过口述史的问题，认为：一是必须要做，二是必须警惕。上海文革史家金大陆先生说，“口述史的价值和它的问题一样大。”很经典。

越人先生来文的意见，牵涉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问题，如他文中所言，是“意有所指”的。讨论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问题，我在拙文中已经谈到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似乎还没有说清楚，所以这里再多说几句，以补文中未尽之言。

关于刘少奇和林彪这些中共高层人物，我是做过一些研究的，可能对林彪事件的研究还更多些。写过一本关于林彪事件的小册子，近来又梳理了这些年来新发现的材料，写了几篇颇有些字数的文章。我之所以转过来再做一下底层民众的

社会生活史研究，也是鉴于林彪事件研究中的问题多多，几乎成了流言和谣言的大卖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盛行。还时常冒出一股陈腐的帮会气。我希望通过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清理一下我们的研究理路，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所以，拙文的写作并不是由于底层情结的萌发，而是复原历史的需要。这点在拙文中有专门说明。

大陆学界的高层研究，长期笼罩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下。过去说，毛泽东是正确的，被他整的人是错误的。现在似乎都又颠倒过来了，正确的变成了错误，错误的变成了正确。其实，都是被同一个政治逻辑给简单化了。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揭示这些复杂性，正是历史研究者要做的事情。所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我不赞成用道德批判的方式。演戏可以搞好人坏人的脸谱化，如果研究历史再这样搞，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好人是从哪里来的？坏人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水浒传》开篇就讲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由，说成是洪太尉不小心放出来的妖魔。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文革流行的路线斗争模式就是这样，打倒谁，就刨谁的祖坟。从祖宗三代就不是好人，该人从小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以后来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大坏蛋……。这里放出的妖魔是阶级斗争理论。现在文革虽然远去了，但在历史研究中，以划分好人坏人为本事的黑白两分法仍然惯性犹在。用给历史人物搞道德审判的方式，代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魔鬼。

在历史研究中，仅以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如同以貌取人一样的不可靠。历史人物行为的善恶标准，都是有时代性的。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不同，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现在认为是杀人放火，在历史上可能就是替天行道；现在所说的暴乱，在历史上可能就是革命。所以，必须要回到历史现场，根据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具体地，就事论事地，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这才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笼统地把几个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比较，讲林彪整人、刘少奇也整人、周恩来也整人、大家都整人，谁也别说谁，这样的分析能有什么意义吗？只能是制造自己的认知混乱而已。后人对前人的研究，必须是走进历史的研究，不能站在后知先觉的道德制高点上评论前人。说到底，如果把我们放到同样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就一定会比前人更高明吗？起码我是不敢有这种自信

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应是具体的，就事论事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不能先后错位，张冠李戴，概而言之，笼而统之。否则，就会有给前人戴“政治帽子”的嫌疑。如越人先生说到刘少奇的“四清恶行”，就得具体说说刘的“恶行”，“恶”在什么地方，“行”在什么地方；说到官方给林彪扣“屎盆子”，“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也起码得说说这个“屎盆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哪些罪名是栽赃陷害的。这样的论说才是有意义的。最起码，也可以避免给人虚张声势的印象。我们褒贬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并不是说对他们也骂也捧，而是看其所讲的是否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的“骂”，与不符合事实的“捧”，都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在林彪研究上也是如此。

我非常欣赏越人先生说的“史实重建”，现在的文革研究，不论是高层、还是底层，都有许多需要“史实重建”的事情。越人先生推崇的署名“千秋”的网络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我早已读过，并不以为然。“千秋”文章的主题是要为林彪翻案，提出了许多林彪与文革高层关系的假说，做出了许多“合理想象”的推论，但这些推论无论想象得如何“合理”，都与“史实重建”没有任何关系。“史实重建”搞的是实证研究，也就是弄清历史事实的工作，是不做无据推论，不搞这类翻案文章的。从“史实重建”的学术要求来看，“千秋”这篇翻案文章的失据硬伤太多，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比如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犹豫再三，前后多有反复。直到决定出兵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中国不出兵。林彪也是这样的情况。但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后，即派周恩来和林彪为代表到苏联与苏方洽谈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至于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的罪名，这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政治需要。关于林彪对出兵的态度，襄赞赴朝军务的情况，著名学者沈志华先生已写有文章，前后过程讲的很清楚。“千秋”直到现在仍然还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这是很不着调的。说明作者还没有走出文革。

还有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充满了各种猜测。其实，如果拂去了流言和谣言的泡沫，基本线索是能够梳理清楚的，没有什么“阴谋论”，

更没有毛泽东故意设套逼跑林彪的问题。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长文《“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批驳了某纪实文学作家在“九·一三事件”上虚构史实的种种伪说。鉴于制造伪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互通声气的一些人，文章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不能搞“帮派史学”。这篇考证辨伪文章所做的就是“史实重建”工作。文章发表后，海外有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撰文痛骂“中央党校史棍搅局”，说把他们这些年的“研究成果”都给否定掉了，但又举不出支持他们“研究成果”的证据。这只能不予理会了。

所以，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一定要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不能因为家庭受到过牵连，就一定要当翻案党，非要向官方讨个说法。我也采访过一些林案子弟，有的人给我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言谈坦诚而心境平和，能够历史地看历史问题。其实，只要不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大家都是可以一起探讨问题的。我认为，翻案是搞政治，实证是搞学术。不赞成把历史人物的研究搞成一门翻案学。如果真有哪位先生对文革林彪问题感兴趣，那就走实证主义的研究路线，扎扎实实地搞清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几件事情，这要比做翻案文章强得多。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是搞清楚人物行状，然后才是月旦人物。这样，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才能言之有据，才能不放空炮。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如果先论是非，后论史实，那就是定见在先了。这是小说家才干的事情。历史研究与搞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是要编造一个情节曲折的好故事，可以定论在先，预设立场，谋篇布局。历史研究则是还原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是需要拿证据说话的，需要在钩沉史料上下功夫，去伪存真，剥茧抽丝，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这才是“史实重建”问题。而“千秋”的文章，只是在几个高层政治事件中做猜想游戏，对社会的文革过程，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文革过程，毫无史感可言，完全是不接地气的。并不清楚民众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却还要在为林彪翻案问题上替人民代言。把自己的声音称为“历史的声音”，还写到文章题目上。就凭这种指点江山的贵胃气，也说明“翻案党”的不成气候。

还是回到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来。我现在关于文革高层的研究还在做，之所以半道上拐弯，又搞了一下底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发现仅就高层研究高层是不容易深入下去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不把中央高层的矛盾斗争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认识，还是停留在单线条的研究范围之内，很容

易把高层的人事摩擦无限扩大,陷入人际关系的姑嫂斗法故事之中了,甚至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编造故事者以可乘之机。而这,正是现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要想真正了解高层人物的实际作为,就不能不了解社会底层和百姓生活。高层决策都是根据他们的“底层实际”来做的。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都是由底层百姓来承担的。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打通了高层与底层的关联,把历史的单线研究扩展为多复线的研究,也就走出了权力斗争史学的偏狭。

打通上下,让历史的多复线关系充分呈现出来,使事件之间因果联系链条更为丰富,会给研究者带来收集、鉴别和解读史料的便利。在历史叙述中,事实是最大的逻辑。在这个上下打通交叉错杂的多重因果联系网络中,一些人为制造的假史料是很容易被剔除出去的,而一些常见的史料也会再次发现新的价值。

当前,在文革林彪研究中,因为档案史料较少,回忆录一类的口述史料占了很大分量。但这些回忆口述并不都是真实的,有的明显就是后人的伪造。即使真实的回忆口述也会有许多错误,如整理者的知识错误,传主本人的记忆错误等等。有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都清楚口述史料的局限性很大,使用时会非常谨慎,不会轻易采信一家之言。但缺乏专业学养的一些学者,往往会为这些口述史料的独特性所吸引,容易轻信“爆料”,造成历史的误读。韩钢教授曾戏言“谣言起于学者”,批评的就是这种情况。林彪事件的研究受这种情况的影响最大。由于专业性不够,造成了当前林彪研究中的虚肿现象,议论多猜想多热闹多爆料多,但实证有据的有学术含量的干货很少。需要进行学术消肿。在目前档案资料不够开放的条件下,消肿之道可能就是拓展文革史的研究领域,建构历史叙述的多复线因果联系,把高层政治置于相互联系的因果网络中去研究。在过去高层政治的单线条研究中,由于因果关系网络比较粗疏,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难度较大。而在多复线研究中,因果关系网络具有多重证据的复合性,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就相对容易多了,不至于让这些一家之言牵着鼻子走。

另外,相对于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居高临下,底层社会史研究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常识学问。高层研究的封闭性强,资料容易造假。底层社会史的研究则没有这个问题。社会史所反映的,总是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土改遗留下的问题,至今还在影响农村社会,而且这个影响还会延续下去。



这里的问题就属于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正因如此，底层社会史的研究，要比高层政治史更具知识的挑战性，更有难度。就难度系数而言，研究林彪事件与研究土改问题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事情。

一般来说，高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信息量，底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知识量。人物研究，门槛较低，进入容易，但问题也会比较大。目前在高层人物研究中，有三多现象：生活故事多，口述史料多，亲友子弟多。许多材料都是得不到印证的独家秘闻。实话讲，这样的研究，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有些东西固然很吸引眼球，但如果定睛细看，就能发现它们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罅漏。而社会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与普通大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肯定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问题的产生也是社会结构性的原因。如毛泽东时代的粮食问题，就是这种性质的问题。这类问题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稳定性，但研究起来需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事情。我比较看好这类具有结构稳定性的研究，认为这类研究确定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域界，使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很难立足。有感于此，拙文《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在结尾处说：社会史研究“可能是破解各种阴谋论的不二法门”。

从高层与底层的互动关系上看，社会中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央高层对这些问题如何认知和如何解决，体现为国家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央政治活动的常态。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政见分歧的出现是必然的。但由于政治体制、决策体制的不同，这些政见分歧的形成、表达和解决方式也不同。在民主体制下，不同政见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有合法的存在空间、通畅的表达渠道，规范的表决程序。在极权体制下，同样会有不同政见的出现。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极权体制也有解决政见问题的固定程序，也讲发扬民主，形成集中。其决策体制就是，通过执政集团内部会议的方式，由最高领袖协调各方意见，做出裁决，形成一致的集体决定。这是以最高领袖为轴心的决策体制。在这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领袖的意志是具有决定性的。这种乾纲独断的人治体制，没有制度的稳定性，缺乏程序的规范性，很容易重心偏移，造成权力失衡。在权力失衡的非常状态下，协调各方意见的民主空间被挤压，不同政见的表达不仅很困难，甚至还会被当成是对最高领袖权威的挑战。文革在打倒刘少

奇、邓小平后，高层政治就变成了一部失衡的机器，决策混乱，自相矛盾，内斗频发。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高层政治运作想象成一部专事内斗的机器。内斗只是这部机器出现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的非常态情况。

从正常与非常的方面看，文革研究的上下打通，非常有必要。在文革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众被领袖绑架了，还要看到，领袖也被群众绑架了；而且，在很多时候，领袖也被他自己绑架了。武汉“七二零”事件时，毛泽东给周围人诵念唐人罗隐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正是这种不由自主的心境写照。所以，虽然文革高层政治的变数很大，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通过文革社会史的研究，可以丰富历史的多复线，扩大研究的空间，恢复认知的常识，把高层与底层、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把高层活动置于时代问题之中去观察，使政治史的研究更接地气。

常识判断是一种观察历史的洞察力。高层政治虽然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任何风云变幻，都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形成。放在历史研究中，这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任何历史事件发生都会有其偶然性。这些历史偶然性的出现，只有放在社会的制度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文革以领袖个人权威颠覆了党国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雷雨季节。所以才有林彪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诸原因中，社会制度因素是最具根本性的因素。林本人既是这部文革机器的建造者，也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因此，放到宽广的社会历史场域中去研究林彪这些高层人物的文革行状，无疑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他们的思想行为逻辑。这样做，应如越人先生文中所言，会对林彪事件和中央高层政治“有更准确的认识把握”。笔者认为，在文革史的高层政治人物研究中，与其相信那些来历不明的尖端“爆料”，让它们牵着鼻子走，倒不如眼睛向下，在社会史中寻找资源，用常识建构文革史的知识体系，以底层研究推进高层研究，形成双向互动，把高层研究建立在坚实牢靠的史实基础上。不知越人先生以为然否？■

【札 记】

## 安徽首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建成记

李嘉树

坐落在安徽医科大学校园内的毛泽东巨型塑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安徽建成的首座毛泽东全身大型塑像。<sup>1</sup>

笔者过去不太了解这座塑像的历史，通过阅读“文革”报刊《安徽八·二七》后，才大致知晓其建成的经过。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安徽也掀起了夺权的狂潮。1967年1月26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为主的造反组织，夺取了安徽省的党政大权。“一·二六夺权”后，“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行使行政权力。“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在合肥市势力很大，左右了政治、社会局势。1967年5月，隶属于“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安徽医学院“八·二七安医纵队”，在没有资料、没有技术、没有器材的情形下，依然决定在校园内兴建毛泽东塑像。<sup>2</sup>

1967年6月上旬，形成了21种毛泽东塑像的小样。这些小样被陈列于礼堂，供“工农兵群众”和“安医的八·二七战士”挑选，最终确定以“第五种”小样为蓝本，塑造毛泽东塑像。第一步是塑造泥型，“八·二七”成员实行三班制，昼夜施工，用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泥型的塑造。为了塑造泥型，从窑厂运来的泥土就有四、五十吨。<sup>3</sup>

第二步是灌注水泥，并拟定于8月1日举行落成典礼，但这项工程却一度中止。其中的主要原因有：

一、中央明令禁止。1967年7月5日，毛泽东就建造毛泽东塑像问题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问题的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另一方面，也提

<sup>1</sup>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徽八·二七》1967年11月27日，第二版。

<sup>2</sup>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徽八·二七》1967年11月27日，第二版。

<sup>3</sup>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徽八·二七》1967年11月27日，第二版。

出建造毛泽东塑像“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sup>1</sup>中央发出如此明确的禁令，建造毛泽东巨型塑像的工程只能停工。

二、“武斗”的影响。围绕着“一·二六夺权”，造反组织出现分化、对立。“八·二七”等参与夺权的造反组织，因为对夺权持拥护态度（“好极了”）而被称为“G 派”；“安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等被排斥在夺权之外的造反组织，因为对夺权持否定态度（“好个屁”）而被称为“P 派”。G、P 两派的论争，发展为 1967 年 7 月、8 月较大规模的“武斗”，造成合肥局势的动荡。在这种形势下，G 派要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安全，只能放弃继续建造毛泽东塑像。

1967 年 8 月 8 日，李德生奉命率领 12 军（代号 6408 部队）进驻安徽。6408 部队在制止武斗的同时，开始恢复安徽秩序。建造毛泽东塑像，得到了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支持。除了安医、“八·二七”外，“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省计委、省博物馆、省物资局、合肥市建设公司等单位的人也参与建设毛泽东塑像。<sup>2</sup>

1967 年 11 月 17 日，高达 10.1 米的毛泽东全身塑像树立于安医校园。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毛主席亲自请来的客人”、“我们最亲密的战友”阿尔巴尼亚同志当天来到安医访问。高度 10.1 米，显然是纪念“国庆日”。根据当初的计划，塑像的基座上还刻上了林彪的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sup>3</sup>不过，因为“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这三十个字被抹去，最终荡然无存。

2015 年 7 月 23 日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现为安徽大学讲师）

<sup>1</sup> 《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问题的指示》，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政策汇集（二）》，1967 年 10 月，页 62-64。

<sup>2</sup>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徽八·二七》1967 年 11 月 27 日，第二版。

<sup>3</sup>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安徽八二七》1967 年 11 月 27 日，第一版。

【札记】

## 读萧军《延安日记》（六）

——萧军的文学雄心与内心的战斗

胡庄子

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

发生人类从没发生过的影响

从萧军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雄心勃勃，野心勃勃。

他说，要建立自己精神的体系。（43-3-29）

他提出他的文学观：“新英雄主义”。他提出了“新英雄主义标准”：（1）为人类（以示与“为自己”的旧英雄主义有别）。（2）争取第一（针对不紧不慢主义，尾巴主义，混混主义，被动主义，温情主义，无理解无主见主义，浪费时间主义……凡事要争取第一为标准：工作、学习、做人……无止无休地竞赛下去）。

（3）强健自己（从各方面：智识、道德、体力、技能）。（4）敢作敢为（创作、言行、斗争、主张、信仰、实践）。（5）不断战斗（和外面的敌人，和自己卑丑的意识和行为、倾向，和自然，和不合理的人物制度，不良的习惯等）。（6）敬爱同志。（7）敌友分明。（40-10-10）

他认为：针对着中国这落后的国民，新英雄主义是需要的，它对于市侩的机会主义，农民的自得自发性的保守主义，乡愿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的懦怯的主义，“有饭大家吃”“持众”的“随龙”的尾巴主义，陈腐的，缺乏朝气的混混主义……是一个革命。中国不用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改造一番，它将要是无望的改到别人。这是一种国民的——人类的——质底提高。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但始者。（42-6-26）

他说：在文学上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到革命的古典主义；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等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形成我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以贯穿我一生。（42-6-26）

他说：我是个以新英雄主义为手段而追求“美”的人，为美丽战斗，为美而生活。……我必不应固定属于某个政治党派，它会限制我接近真实，说出真实。

(42-1-21)

他说：战斗即生活！这是我新英雄主义基本的信念。吸取一切好的，扬弃一切坏的，批评一切丑的，这是我新英雄主义的方法。在政治上它是共产主义的，在哲学上它是唯物辩证论的，在方法上它是现实主义的。我有工夫将要把它写成一个较系统的东西。“人民大众党”，以批评各党派的缺点为基本任务，解除无理由的党争，在中国是需要的。（42-10-30）

他说：那文坛上的苍蝇和小无赖们，他们总是时时寻找一块痰污或垃圾把自己聚集起来，来显示自己，等到这痰污干了，再去寻找另一片……。我一定要不和他们合作，我不在这些刊物上投稿，我可以沉默地走自己的路。我要等到他们疲乏了，无能挣扎了，我给他们一个恶毒的扫荡！……我要单身独马行走，一支笔，一个头颅，两只拳头，我要冲毁这个市侩的雾圈。不怕与一切人为敌，做一个光荣的孤立。现在我要退隐和沉默！（1）聚集资本。（2）修炼技巧和获得一切学问和知识。（3）准备战斗。我应该像成吉思汗或拿破仑那样，虽然以剑征服世界我无望了！但是我却要以笔征服这世界！至少是中国。（40-9-23）

萧军不停地写作，认真地积累素材。他期望：希望在战争停止时，我们每人能有五部或十部稿子在手边。（40-10-6）

他说：从鲁迅先生那里学杂文，高尔基那里学论文，托尔斯泰处学小说，荷马那里学诗歌，新旧约里学通俗的文体和忍耐，马列那里学科学的精神，史达林那里学意志，我要吸饮这些伟大人们的精神，而后酿造我自己的蜜。（42-7-16）

他计划：将来准备给鲁迅先生写一本完备的传记，也想给毛泽东写一本，但还未决定。（42-3-3）将要写三部传记：一部是鲁迅，一部是萧红，另一部是自己。（43-2-9）

他说：我或者也许写成一部小说，以中国和希腊的精神为基准，定名为：《新英雄主义者底战斗》。中国是需要这样一部小说的。或者就名为《人》，以自己的童年一部分为材料。（40-10-10）

他说：我要写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材料小说。（42-7-9）

他说：中国历史上的陈涉、项羽，黄巢我是很喜欢的，有工夫我预备写些历史小说。（41-12-16）

他说：我将来写一部连续性的自传体小说，什么也不管，第一要真实，中国

不能写我到外国去出版、去写。就以我的日记为底本。我要向人类呈献出我这人，让他们去解剖。（42-6-4）

他说：在四十岁之前，我要完成这初步根基。四十岁以后，我要开始从一八四〇年起，试写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分二十部，写到八十岁，两年一部。我要从世界各处获得我所要获得的。我宁可被“雄心”积压而死，不愿为无事做而死。我要发生人类从没发生过的影响！（42-4-4）

他下决心说：我计划用：诗歌，戏剧，小说这三种形式交替，写下由1840以来的中国历史，让它们消费我四十岁以后的生命。用论文扫清一切邪魔，用杂文击破社会的恶相。（42-4-19）

他说：我知道我的任务，应该用文艺的力量影响教育这些高级负政治责任的人，他们对文艺确是缺乏的。（41-8-16）

他说：忽然想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定名为：《乡村》，《都市》，《军中》，《祖国》。这要得把《第三代》写完及把长诗改好，才能着手。这也就是为我四十岁一部分结集。四十岁写《世界》；六十岁写《人类》到八十岁。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计划，我要做为这个世纪的历史而存在。（42-10-29）

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萧军说：“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他的志向大得很，牛皮也吹出去了。但是，毕竟到延安后没有大作品。有人讥讽他说，因为写不出创作，所以来做文学运动。（42-5-25）贺龙有一天也问：“那个写诗的叫什名字啊？……萧军这个人全写过啥子啊？这样大的牛皮啊，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这些话传到萧军的耳朵里。萧军也承认：“是的，我已经四年多没写创作了……”。（42-6-8）

有人在《解放日报》上写文章，影射他。他一方面认为，“文章是愚蠢而舞文无味，我为共产党有些悲哀，尽用些这样二流子充理论家是没有好处的”，又想到：“我所感到一些痛苦的，就是没有一个使自己战斗的堡垒——报纸之类——不能给一些混蛋们立即的回击。”（42-2-25）

他憧憬着：战后一定要自己开一个出版社。我是不能和一般人合作的，尤其那些有私人目的的人。……我要建立自己一个体系：刊物，出版社。（42-9-18）只是用将来的梦，支持着现在的疲倦。想着印刷自己的文集，组一自己的出版所，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地方，现在只有耐心地走过去。（42-9-27）

他说：我底写作是为了改变人类的品质，提高人类的情操，团结人类，鼓励人类，消灭人类一切丑恶的。……我是具备着鲁迅式的，东方人一种明敏超乎物力的大胆，对于死亡带着一种宿命的轻视似的忽视，超功能的，执行着自己的信念所给予的任务。（43-2-21）

他说：四十岁以前为准备时期，六十岁以前为创作时期，八十岁以前为研究与建设理论，总结经验时期。（43-9-17）

他设想：将来老年时，自己写一部《艺术论》。（43-8-29）

他说：我的精神将要成为将来人类精神的标志灯。（43-8-6）

……萧军就这样一边给自己订着巨大的计划，一边在延安贫瘠的土地上生活……

如今，回首萧军的一生，他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加上命运多劫，他到死都有未竟之志、未践之行，可惜了他一腔热血与抱负。

## 上帝把一只狼作为一匹驯鹿放在花园里了

“上帝把一只狼作为一匹驯鹿放在花园里了。”这是萧军1942年9月7日日记中的一句话。

“我是王者才而非臣者才。”（42-11-5）萧军自视甚高。

他说：我本是个大胆无忌的浪子，如今要“规矩”起来了，这有时确是感到不舒服。（44-4-3）

他的日记中下大力解剖自己，诉说他的远大志向，他内心的巨大矛盾，他的爱恋情仇。

他说：我伤心，我要哭，我应该吞下自己的眼泪，挺起胸膛来吧！无论遇到什么迫害，总不应该使自己丧掉自尊和强梁的姿态啊。（40-9-14）

他说：我应该练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科学的勇敢者，认明真理的勇敢者！能克制自己的勇敢者，不拘泥于情和物的勇敢者！（40-9-15）

他说：我有些性格总近乎托尔斯泰：藐视一切，憎恶浅薄的机智和趣味，人性和兽性的矛盾，质朴，嫉妒！不爱市民阶层，不喜欢哥德和沙氏比亚的作品，也不喜欢自己的作品，甚至那艺术否定论的倾向！我们底出身也似乎有些相似，只是我不爱赌博。（40-9-22）



他说：在我的感情中，总是存在着赞颂上帝也赞颂恶魔力量的一种倾向的。

（43-3-8）

他说：女人，孩子，他们卑屈了我，拖累了我，庸俗了我，软弱了我……但却强韧了我，深刻了我！一个为人类的人常常是被人类钉在十字架上。（40-10-2）

萧军发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不美好人物，他说：我一定要深刻地写一写这些革命的流氓！（40-10-2）

他在日记中盘算着：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了：（1）郭沫若系统。（2）田汉系统。（3）阳翰笙系统。（4）国民党系统。（5）成仿吾系统。（6）周扬系统。（7）萧三系统。（8）山西阎锡山系统。（9）茅盾系统。（10）……好！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把我怎么样。“存在的是我，决不是他。”（41-1-16）他说：“凭道儿郎尽楚歌，兵临十面待如何。”

他说：我此后对于自己要更残酷，对于敌人也要更不姑宽。要稳，要准，要狠，要刻毒地保护自己，战斗敌人。（41-1-19）

他说：对于真实的王国里我无份了，我要在精神的王国里去称王。（41-3-7）

他对延安埋怨道：这里是没有作家存在的，有的是政治和军事与技术。（41-5-12）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这是这里的情形。（41-7-9）

他自画像：我是军人与流氓性的人。（41-5-13）

在组织召开的一个生活检讨会上，萧军负气地说：如果这发生谣言的没有结果，或再有所新的发生，无论是谁，我是以此地组织是问，轻者我骂，重者打，再我就捅了他……我拼上几年徒刑……。萧军在日记中描写道：我把我的短刀插在桌子上了，它在灯影里动着红绸，人们是沉默的。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要用刀对付他们。（41-5-26）

他说：我近来为了饮食很苦恼着，我恐惧这样生活下去会伤害了我的身体，我要去借钱，吃得更好一些。这里的伙食是刻板的，监狱似的伙食，早晚两次小米稀饭，一顿馒头，几片山芋，没有一点油水，毫不能刺激食欲。我知道那些做政治工作的人全比我们这“文化人”吃得好。这里所谓优待“文化人”是形式的，一种政治的策略，我不能使我自己损害啊。（41-6-10）

萧军也知道他的性格伤害了一些人，一些人误解了他，他说：我知道我将来是“敌满延安”。（41-6-10）

他说：在这样社会，只有我这样的人——“流氓”的手段，“强盗”的果敢，真诚的心——才能战斗下去，而且胜利。（41-7-6）

他说：要将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41-7-8）

他在诗歌中写道：我是狼，我是野生的狼！（41-7-13）

他要求自己：要像一头凶狠的兽，咬住不放，宁可挣扎断了自己的牙齿。（41-7-27）

他说：我的心是一条不安的蛇啊！它翻腾而咬啮着我。（41-8-2）

他说：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什么人的面前，自己应该像金刚石和最坚强的金属铸成的雕像那样，用自己的光明看一切，吸收着一切，随时把自己的重心找好。（41-8-6）

他说：我将要变成一个有多量吸盘的动物，能吸及一切，容纳一切，消化一切……（41-7-28）

他说：“我像个流氓，土匪头……一个人就是人，其余的都是他以外的东西……”

他坦陈：“我是很喜欢潘金莲那样的女人，那是健康的人。我是很喜欢和我差不多的那样的女人恋爱，彼此即使分开，无论在良心上还是什么上，全不负担什么……”（41-9-24）

他反思说：有些地方自己确实不需要那样固执、张狂、浪荡和跋扈。（41-11-29）

他有些狂想：总是意识着自己总有掌握中国政权的一天，创造历史和写历史我该兼着。我年轻，具备着足够的意志，学习的热情，自信的力量……以我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建立新中国。（41-10-8）我相信我是有能力把中国人民领导到更好的生活路上去的。准备等待啊！（41-10-17）

萧军几乎天天在延河边上练习唱歌，他说：我预备十年后成为一个伟大的歌者！（41-11-4）

萧军演说自己的主张：我到边区是干什么来的呢？是追求民主的。为什么要追求民主呢？因为民主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因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只有老百姓管天下，才能真正替自己谋幸福谋利益，所以我们要民主。（41-11-6）

他说：抗争是我生命的力！没有抗争，我会死去！

他分析了自己与一般人的隔阂所在：“他们是公式的，事务的，我是人生的，艺术的。”（41-11-11）

他大声说：知识分子是无良的！（41-12-3）

他有时也谦虚地说：我是一个中才的人，我一定要从各种艰苦学习中，才能完成自己。我要自己创造我的一切！我是主人，我不借用别人的势力和思想，我决定我自己的一切。（41-12-3）

他说：从事艺术的人应该学项羽，不该学刘邦。前者在事业上失败的，但在性格的完成上是成功的。（41-12-8）

他说：要把自己准备成一个：政治、军事、文化主帅的角色，可以不用，但不可以不准备。（41-12-16）

他说：我的野心燃烧着我，我要做一个整个人类的文化承继者和综合与开拓者啊！我的先生他仅是民族的，我要是人类的啊！要由我这里把整个人类的文化、文学，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给它以指路和奠基。这野心会引导我贪婪地前进，也会压碎我在半路上。（41-12-19）

他说：我应该准备各种能力，对于中国毛泽东的政治，朱德的军事，鲁迅的思想文学，我应该吞吃了它们变为自己的。对于世界的列宁，托尔斯泰，马克思，拿破仑……我也应该吞吃了它们，变为自己的。我要成为拯救这人类向高级发展的一条这世纪惟一的绳。我要承继人类一切最优秀的东西，经过我再给与人类一些什么。（42-1-4）

他说：我必须要从各方面锋利、坚固我所有的武器和甲冑，积蓄我的力气和战斗的经验，才能够安然地生活在敌对者的群中，像生活在自己的家，生活在战场上像散步在花园里。（42-1-22）那搏斗的疮疤啊！已经结成了我坚强的甲叶！（42-1-26）

他说：我则是从那些卑污的腐朽的无力的尸衣里层层挣扎而出，正在走向辽阔的前方。我是新生的力量底代表者，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从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作家能够和我相比的。我不独是这民族解放第一个点起鲜明火把的人，而且还是个战略指导者，我不愿在里谦卑，我是这古老的伟大的民族一朵伟大的鲜花……。我具备着马克思、列宁、鲁迅、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人物的

某部分品质，我有着一种释迦牟尼，耶稣，摩西，穆罕默德等人物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我将要慢慢完成这质量和精神。……中国人给与世界的东西太少了！要由我这里给与了。（42-2-17）

他说：我读书主要是把自己灵魂上的渣滓清洗下去，使自己由浅浮到深沉。（42-3-16）

萧军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或者弱点，他说：我自己也要尽可能克服一些神经过敏的不必要的疑心和嫉妒。（42-5-8）

他说：我不能顾到个人的毁誉，个人底伤害与孤立……为了真理，决不相让。战斗、战斗、战斗……。42-5-15

他自信地说：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里。（42-5-25）

萧军常有从事政治、做政治家的想法，他感叹道：可惜我只是个文学上的列宁。（42-5-28）

他说：支持我的是一个近乎可笑的雄心和意志，我几乎在一种雄心的膨胀里燃烧着！它使我焦躁，狂妄，也使我前进。我的征服欲望太强盛了，到了病态的地步！我是不甘心仅做个“文人”的，还要做个“事实上”的征服者，我爱武功。但我的运命却只能使我老死在笔墨上了！我将一生不甘心走进这生涯的路！这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上帝却把一只狼作为一匹驯鹿当在了花园里了。（42-9-7）

1942年11月8日，萧军和人打架，是非经过且不细说。12月27日，法院判他六个月徒刑，缓刑二年。尽管如此，他在延安仍受到优待，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他是自由的，还给他配了一个“小鬼”，帮助他看孩子。他说：我自己思量着，要离开这里的欲望就更强烈。要找一个都市去，有一个住的地方，和这政（治？）远离一点吧。我在这里感到愉快，威胁，憎恶，这并不是我的“乐园”，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吃别人供给的饭，我要像一只狼似的自己寻生活去。（41-4-30）

萧军的内心里，自我始终战斗着……■

【访谈】

## 在中国遭到隐匿的历史

——采访纪录片制片人胡杰

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主访人：张彦

受访人：胡杰

时间：2015年6月25日

地点：南京的胡杰工作室

方式：录音

胡杰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制片人之一，尽管他的作品在中国始终没有公映。他以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三部曲闻名，其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讲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的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我虽死去》（2007）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教师的故事；而《星火》（2013）则讲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谨的大跃进。

最近，57岁的胡杰创作了一组关于大饥荒的木刻版画。这组版画是基于他为制作《星火》而进行采访时所创作的绘画作品。这组作品原定于去年在天津进行首展，但是由于其争议性，展览在开始两天后停办。

以下是访谈实录，内容经过编辑和删节，经过受访者审阅。

**张彦：**你的纪录片拍起来一定困难重重，因为这些题材的影像资料太稀少。存在什么记录大饥荒的历史影像素材吗？

**胡杰：**没有影像资料，连照片都没有。当时中国的农民太贫穷，被剥夺了一切，孤立无援，没有任何手段来记录他们自己的命运。

**张彦：**你在制作《星火》时，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胡杰：我参考了很多档案，因为我认为档案是必需的，否则片子没法拍。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张彦：《星火》讲述了几个学生为记录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大饥荒而办杂志的故事。他们只出版了几期就被捕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有人对我提到过这个杂志。后来我找到了他们办的仅有的两期杂志，采访了幸存者。当时很恐怖，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何而死。有一个人讲，他以为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打死的父亲是反革命，他在接受采访时羞愧万分。还有一个人讲，他以前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当时有勇气站出来揭露大饥荒。他的父亲曾经支持了这些办杂志的学生，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

张彦：关于大饥荒的书对你有没有影响，比如杨继绳的《墓碑》？

胡杰：我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杨继绳的书。后来，我在做的过程中了解到他在写这个书，所以我也去采访过他，他也给我提供了许多线索。

张彦：你是怎样对拍敏感题材的纪录片产生兴趣的？你早些时候的一部作品——《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讲述了一位在大饥荒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女性。

胡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小学阶段不了解反右运动，在中学时也只知道右派是坏人，也没有任何这类书籍。所以我们对反右和大饥荒完全都不了解。当我开始接触到这个题材并开始采访林昭的一些同学的时候，他们每次所述都让我震撼不已。我意识到这段历史的每件事情都被掩盖着，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我觉得把这段真实的历史说出来，非常重要。我花了四年拍摄、编辑这部片子，做好以后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让几个朋友来看。他们提了一些极有见地的主张。

张彦：之后你拍了《我虽死去》，这是一部讲述文革期间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女校的学生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故事。

胡杰：我完成林昭的纪录片以后，突然发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纪录片，但是他们大部分比较年轻，且志不在历史题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做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比其他人的年龄大一点，所以对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有一些记忆。我小时候亲眼目睹了很多，比如武斗、打人、批斗会甚至杀人。所以我想我应该做的更多，因此拍摄了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北京一所著名女中的校长卞仲耘的故事。

张彦：《星火》（有时被翻译成《灰烬》）在去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拔得头筹后，我对你把历史景象一步步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技艺十分叹服。你把我们带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亮出相关证据，与那些幸存者和目击者交谈。你始终关注人。

胡杰：我把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反复看了很多遍。通过DVD，尤其是许多盗版的DVD，我看了不少外国的纪录片。我从这些影片里获得了非常多的拍摄方式和编辑方法。

张彦：下面我们看一看你创作的关于大饥荒系列的木刻版画。这幅展现了一对夫妇似乎飘浮在空中。

胡杰：大地贫瘠而荒凉，这两个人飞了起来，这其实是他们的灵魂升天了。这是一种错觉，就像共产党所谓“明天是美丽的”，但是人们却在明天死于饥馑。

张彦：每一幅版画都源自一个特别的故事吗？

胡杰：是的。这些版画内容大都出自于我在制作《星火》过程中的采访。还有一个叫依娃的朋友的故事对我影响尤深。依娃是大饥荒逃难者的后代，她移民美国之后写了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并希望我做插图。因此有几幅版画是根据她的经历而创作的。

张彦：有些版画则暗示着，一些做法和规定令大饥荒雪上加霜。

胡杰：比如说，当时老百姓逃荒是非法的，逃荒者被称作“流窜犯”。我采访时有很多人告诉我，当时到处都是大标语，禁止农民逃荒。

张彦：你也做了一个叫做“我们”的系列，这个系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充满希望。这幅画显示了一个小男孩抬头看的样子。

胡杰：这幅画表现的是，在一条将有领导人的车驶过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个小孩抬起了头。实际上，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包含着希望，因为其中总有某个人不接受官方的叙述。

张彦：你为什么考虑用木刻版画的表現形式？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那时中国也使用木板刻画表现形式的一些艺术家。

胡杰：没错，这些艺术家都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认为版画是表现真实生活的一个载体，因此特别倡导版画木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木头上进行雕刻的过程，就是与现实直接接触的过程。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他们一下子和世界接轨了，尤其是和西方艺术也接轨了，但是与此同时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与中国甚至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了。我并非苛求这些艺术家，但他们追求的是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

张彦：你生于1958年，正是大饥荒开始的那一年。由于你的父亲是军人，你没有遭遇大饥荒的冲击，但是你个人受到了文革的直接影响。文革1966年爆发，你当时8岁。

胡杰：最初学校先是停课，复课之后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学。学校基本上就是每天要参加批判会、游行、斗争会和斗争老师，但当时很小。因为我们家里的成分不太好，所以我妈妈会经常自我批评，并表现自己。她是医生，经常要到工厂给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所以她不太管我们。我爸爸是军人，他不在家里。当时我是老大，家里很多事情都需要我自己做，并且还需要照顾两个妹妹。

张彦：所以说你受的教育要从中学才算起？

胡杰：是，到了中学才开始学习。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应该说学习的东西很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经常为了生存而奋斗，做过很多事情。比如说虽然我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养过鸡、鸭、羊和好多其他的动物。养动物是赚一些钱



的唯一方式。虽然学习很少，但是它使你对生活有一种理解，我也逐渐学会照顾自己。小时候，我们小男孩也打架，我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张彦：**你是怎样对影视和艺术产生兴趣的？我觉得你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中成长的过程中，对艺术的接触应该比较少。

**胡杰：**我从1989年到1991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这两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开始了解北京的艺术界，以及艺术如何来反映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因为当时“六四”之后，整个社会是非常沉闷的，没有人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通过和一些艺术家个别的接触、交流，我慢慢知道艺术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

**张彦：**你1992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开始在中国国内探索。你住在圆明园，开始拍电影。

**胡杰：**当时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拍纪录片，甚至连一本关于纪录片的书都找不到。我觉得社会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媒体的宣传却只有正面的消息。所以我感觉到这种宣传和现实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些记者都不说真话？我又想，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说真话？于是我请一位朋友在日本帮我买了一个超8摄像机，然后我去了青海，去了不少煤矿，并且拍了很多纪录片。所有的拍摄都是在社会底层，因此我遇见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穷人。

**张彦：**之后一小段时间你为新华社工作。

**胡杰：**我觉得在新华社很有意思，我当时拍那些被抓起来的贪官。监狱中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心里话，并且哭哭啼啼的。还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个县委书记的举报。他去工作的第一天就被黑社会打了，并且黑社会告诉他应该怎么工作。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经历。但是后来他们可能发现我在拍自己的片子，所以就让我离开了。

**张彦：**是不是因为你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

**胡杰：**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我在拍林昭的故事。因为我在新华社工作，接触到的信息比较多，而且也知道他们可以采访什么，不可以采访什么。但是我觉得林昭的故事太重要了，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人敢说真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敢说

真话。所有人都怕死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怕死。所以当时我在为拍这部纪录片采访的时候，也觉得自己逐渐开始了解原来那些我不了解的历史。

**张彦：**作为一名纪录片制作人有多么困难？

**胡杰：**我从来不接受外界的捐款，尤其是海外的。我只是在比赛上赢得一些奖金。警察对于这一点告知得很明确，所以我不能拿别人的钱。并且警察知道关于我的一切，比如我要去哪里，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并问我：“胡老师，你到哪里？我们可以派车送你去。”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前通知一些人不要接受我的采访。

**张彦：**你的纪录片目前在中国无法公映，对此你作何感想？如果中国的观众看不到它们，你觉得还有意义吗？

**胡杰：**意义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去做这个纪录片，这些人就死了，以后永远也没有人对着镜头再说这些话了。官方肯定不会去做，那民间如果再不去做，很快就来不及了。《寻找林昭的灵魂》里，现在有十几个人重要的人都去世了。

另外，其实在那个最艰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杀头的。但是他们被秘密地处死了，我们后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他们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不去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剧。

《星火》中，有一个办杂志的人没有被枪毙，但是被判了18年。他当时就在法庭上骂这些法官。他说到处都是尸臭，并且问法官闻没闻过。我觉得有这么勇敢的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经历的这段历史，这些记忆就会永远消失。■

本文于2015年5月27日首发于《纽约书评》，作者授权本刊发表。

董一夫对本文的中文翻译有贡献。

【述 往】

## 插队的那些事（十二）

### ——看地的营生

朱 特

雨村的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难免出现些小偷小摸的事，还有就是家畜对庄稼的糟蹋。这时雨村的各个生产小队都要派几个人当护青员，也叫看地的。看地是轻松的好营生，是个不“坐班”的活儿，用不着参加大田里繁重的农活。每天的早晚儿到地里转转，遇到有人偷青当然要进行捕捉，遇到家畜到地里打食也要进行驱赶。这个活是许多男子汉想争取的活，不累人也不少挣工分。看地人的标志就是手里的镰刀——这是秋天里用得最多的农具。

这年秋收将到的时候，生产队长金良让我做看地的营生，我心里很高兴，可以不和人们一样的“按点”上下班了，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头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没有经验，金良就言传身教，当了我半天的师傅。他先领着我把要看的地块——指给我看——说来惭愧，到二队一年了，还不知道哪些地是自己队里的——告诉我哪些是重点要看的，要来得勤些。他说，人们下地前要到地里转转，下地的人来了你就可以回去休息；等众人收工了，你就再出来，晚上还要出来看看转转，但要小心呀。我底气很壮地回答：没啥！他又说，如果有牲畜出来祸害，尤其是猪，你可要狠狠地打，那些东西有时也记打着呐，你狠狠地打它一次，下次它就不敢再来了。我说，没有问题，打人不打猪还是没有问题的。说着话，眼尖耳长的金良发觉地里有动静，就跑过去，我在后面也紧紧跟上。

跑到跟前一瞧，原来一头半大的猪正在地里又啃又拱又刨地大嚼呢。金良骂了一声，这是谁家的猪，也不看严点跑出来糟蹋庄稼。他大叫一声：猪！狗儿的！抡圆了手里的镰刀给了狂吃海塞的东西狠狠一镰刀柄（万不可用刀）。那猪似也早有准备，只见它往前一蹿，镰刀柄的打击的力量减少了不小。它回过身来就想往村里跑，金良向我喊，拦着它，别让狗儿的跑回去。

我立刻张开架势准备迎头痛击，那畜生一见就又调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金良跟在后面，不时调整那猪的逃跑方向，我也紧随其后看着队长怎样收拾这只闯祸的猪。

只见金良把那头猪轰赶到了一块刚刚耕好耙平的土地上去。这样的土地既松软又平整，人走上去就像踏进厚厚的雪地，松软的土壤会没过脚面。我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把猪赶到这里来，人到这样的土地里跑起来格外费劲还怎么赶猪呢？过了一会儿，我恍然大悟，人在这样的地里跑动费劲，猪到了这里跑起来就更困难了。四条小腿在这样的土地里就像四根竹签深陷松软的土里，哪里还带得动硕大的身躯。不一会儿，那头猪就累垮了，金良走到那畜生跟前好一顿皮肉教训，直打得那东西撕心裂肺地嚎叫而不能挪动半步。

教训完那头贪嘴的猪，金良对我说，猪一到这样的地里只有挨揍的份儿，这回它记住了，再也不敢来祸害庄稼了。这一幕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打心眼儿里佩服队长金良。我们离开那头可怜的猪时，它还半蹲在松软的田野里嚎叫，不知是检讨自己的过失还是大骂揍它的金良。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看地的营生。每日里起早贪黑，走走转转，一开始还觉得挺好，但时间一长就感到过于冷清了。于是白天就拿着“同插”带去的一本古诗词选，随便找个地方半躺半卧地翻看。最初是为了解闷，时间一长我喜欢上了这种音韵意趣绝佳的文字。只是因为文革我只正儿八经地上过8年学，那点文化底子太潮，不能完全读懂它们，但仍被其中所蕴涵的精神与气质所感动。在蓝天白云下广袤的田野中，嗅着秋天的气息诵读那些千古绝唱真是快事一桩。不管是小桥流水还是大江东去，都给我一种不曾有过的阅读体验。

晚上，星光笼罩下的田野寂然无声，只有秋虫在活跃着，它们不仅悄声吟唱还在黑暗中约会，不时有什么小虫从耳旁飞过去赴约，让人一惊。穿行在远离雨村的一人多高的大庄稼地里还真有点瘆人，秋风起处一片哗哗声，似乎有人走动，细细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仿佛见了鬼，不由得出一身鸡皮疙瘩。于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吼上一两嗓子样板戏。老乡讲话：捉贼不如驱贼。弄出点响动来彼此都好。走夜路唱小曲，谁胆小谁知道。

一连多日都平安无事，偶尔遇到了一匹小马驹子在庄稼地里撒欢，我想把它赶出来，但异常灵活的小东西辗转腾挪总是不肯就范。小马驹的母亲——那匹老马就走在旁边的大路上一声不吭地拉着车默默地走着——对我的举动敢怒不

能言。这时一位跟车的老汉喊住了我：后生，小马驹子闹地是玉皇大帝特批的，做不得驱赶，它就像个吃奶的孩子，走到哪里都是“官吃”的，就是进了皇上的御地也是如此。让它撒欢吧，一旦笼头嚼子一上头，它也就只剩下受苦的份了。闻听此言，我怦然心动，停下脚步，看着那个可爱的小精灵追赶它的母亲去了。

一天队长金良找到我说，你要注意了，有猪在糟害村南面的那块玉米地呢。我的脸红了，这分明是说我失职。于是我格外留心起来，想找到那头肇事的猪，让它尝尝我的教训是何等的深刻。第三天中午，我终于在地里撞上了那头偷嘴吃的猪，看来它是吃出甜头来了。

那是一只大个头的黑白花猪，大头大脸大耳朵，尤其是大肚子，肥硕的都拖到地面了。这家伙是吃不义之食才长得如此体面。面对不速之客，我学着金良的样子大喝一声：猪！狗儿的！那个正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的家伙见我来者不善，连个招呼都不打调头就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坏我名声的另类，一定要拿出看家本事好好给它上一课。

我学着金良的样子，把它往松软的田地里赶。跑出去一里多地，那个家伙终于跑不动了，我也是一身臭汗气喘吁吁，但没有忘记手里的镰刀柄，我要用武器的批判使它的大脑皮层留下什么地方的吃食是不可以随便去吃的深刻印象。

每打它一下，它都一声长嚎往前蹿一步。在它的臀部挨了我不计其数的打击之后，这个家伙突然掉转身体向我呲开长长的大嘴巴。我一下愣住了，手里的镰刀柄也悬在空中。怎么着，还敢跟我开牙？它两只猪眼发出凶恶的目光，大长嘴发出狠狠的声音，好像是说，我跟你拼了。我向它喊：反了天了，告诉你今天是给你的警告，如果还有第二次，我会让你的身上见血！说完我三步一回头地走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我赢了还是猪打败了我。

当所有的庄稼都从地里收割回家后，我看地的工作也结束了。

很长时间之后，村里的一个后生对我说，秋天你看地的时候把某某家的猪打得流了产，糟蹋了一窝小猪。我很吃惊，想起那只最后要跟我拼命的黑白花猪和它那硕大的肚子。后生还说，因为猪的主人成份高（是地主出身），再者你是知青和他家无冤无仇，如果换了村里别的人，不会就此罢休的。

听后，我的心情复杂，无以言表。■

【述 往】

## 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二）

徐米甘

## 三、小学

孩子上学分学区，历来如此；但是50年代似乎没有“学区”这个名词，而是说就近入学。当时甘家口一带居民较少，学校更少，所以要走半个小时去上学。到了58年我大弟弟该上小学的时候，展一小不收纺织设计院宿舍的孩子了，这拨孩子大多数上了建工部子弟小学。到了62年我小弟弟该上小学的时候，建工部子弟小学又不收纺织设计院的孩子了，这拨孩子有的上了展一小，有的上了甘家口小学。那时的家庭，一般少则两三个孩子，多则五六个孩子，现在回头看，有些不可思议，不知孩子是怎么养大的。五十年代主抓经济建设，六十年代主抓阶级斗争；纺织设计院的家长们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学习，养孩子是属于“散养”，不怎么管。

大院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建工部是少数的特例之一；建工部管城市建设规划，这也算它给自己开的“后门”吧？至于甘家口小学，因为它收了很多五十年代建设的甘家口平房居民区的孩子，被周围建工部、纺织部设计院、百万庄这些大院的家长和孩子们看不起，仅作为不得已时的择校对象；包括紧靠着甘家口小学的甘家口八号院，这个院也是四层的楼房，住的也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据说事迹进入小学课本的英雄吴运铎就是住在这个院子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名的慈善家李春平父母在国家机关工作，也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大概在1960年左右甘家口小学两个孩子打架，一个小孩被用刀子捅死，听说捅人孩子的家长赶到学校，抱着奄奄一息的受伤孩子一口气跑到医院，可惜未抢救过来。此事口口相传轰动周围，也成为甘家口小学不靠谱的进一步证明。

香山慈幼院的名字和外观都比较神秘。当时北京的单位、住宅区、学校一般都没有围墙，但在纺织部设计院新宿舍南边的香山慈幼院有着高高的围墙，隔着围墙的铁栅栏，可看见里面的孩子既有幼儿，又有小学生。当时我只听名字，以为是个幼儿园，后来知道里面有小学部，而且是住宿的，这在北京当时是少有的。

后来又听说它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办的，但为什么不在香山而在甘家口还是不知道。尽管香山慈幼院紧靠着我们的宿舍，当时我认识的孩子没有在里面上学的，我想一定很难进。为写此回忆我网搜了一下，香山慈幼院词条下记载着它的成立经过：1917年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淹没一百零三县，受灾百姓有六百多万。当时民国政府官员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两所，收养灾民儿女千余人；水灾平息后，仍有二百多儿童无人认领。为教育这些儿童，时任总统徐世昌决定将前清皇室所有的香山静宜园拨出，建慈幼院男女两校；督办人熊希龄关心贫民儿童的教育，建成了可招收北京城内外贫苦孩子千余人的大型学校包括幼儿园，于1920年9月开学。

熊希龄是军阀吗？他为什么要办学校？带着疑问我又网搜了一下：他1870年生于湖南，1894年考中进士，曾帮助湖南督抚陈宝箴推行维新变法，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在湖南办教育、实业，主持常德西路学堂，先后创办瓷业和矿务公司。1911年建立民国以后他进入政界，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统治，退出政界，转而专心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并成为佛教徒。1938年，熊希龄在香港奔走抗日和慈善救济事业时病逝。原来熊不是军阀，是个文人兼不得志的政客，但在其人生最后20年步入事业之辉煌，获“近代慈善之父”的盛誉。他办的香山慈幼院聘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为该校的评议委员会，研究教育方式。该校办学模式很有特色，一是坚持只收孤儿和穷人的孩子，所有费用免费。后来学校有名了，有权有势有钱人的孩子也想进来，却要收高额的学费，且只能作为区别于正生的附生。二是他首创了小家庭教育模式，在慈幼院中建立了11个小家庭，分别以“勤、谦、俭、恕、仁、毅、公、平、信、义、醒”命名，每个家庭十余个孩子，选择一位保育人员担任“妈妈”，这比1949年奥地利建立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十几年。熊希龄于1932年其妻朱其慧女士因病去世后，宣布“裸捐”，将全部家产计大洋27万，另有白银6万余两，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支持救助儿童的公益事业。熊希龄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当时美国记者参观香山慈幼院后，谓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只因熊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当过半年的国务总理，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将他遗忘了，致使我作了香山慈幼院十几年的邻居，却对它一无所知。其实新中国的历史不该将它遗忘，还因为它

在 1949 年与新中国的成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是我在今天网搜后才知道的。

我原来想当然的以为，可能是因为香山公园要向公众开放，也可能是因为那里距离北京城区太远学生上学不便，所以香山慈幼院迁建于阜成门外的甘家口。网上信息告诉我真相：1948 年底，平津战役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就在准备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考虑香山慈幼院有 3000 多间房子，且和西山相连，易于警卫，又便于防空，中共中央派人以劳动大学的名义找香山慈幼院雷洁琼董事长商谈借用校舍。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到香山慈幼院与院方商定，将有 1000 多名儿童的慈幼院迁址到北平城内西安门大街 26 号。3 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搬入香山慈幼院空出的房子，毛泽东就住在熊希龄私人的双清别墅，在这里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直至 1951 年中共中央才搬入中南海办公。毛泽东说：“我们用了慈幼院的房子，要多照顾他们……有什么事就直接找彭真市长。”1952 年，政府决定在阜成门外为慈幼院再兴建一所正规校园，虽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但学校的工程设计标准和工程质量都是那个时期最好的。1954 年春，香山慈幼院迁入新址，但此后的香山慈幼院已从招收孤贫儿童的学校改变成一所招收干部子弟的“贵族”学校。1966 年，文革中的香山慈幼院作为北京最后一家私立学校（也可能是全国最后一家，但只是名义上的私立学校，实际上所有经费均已由政府拨给）被收归国有，改名为立新学校。

以上跑题，写西郊纺织大院回忆写到它的邻居，且不是我本人的回忆，而是网上寻迹回顾，作为教育折腾的一个实例介绍。中国很多事，都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出发地。1984 年，中国仿造奥地利 1949 年为二战孤儿创建的国际 SOS 儿童村，建立了天津和烟台的 SOS 儿童村；到 2009 年，中国的第十家国际 SOS 儿童村在北京大兴建成。这些儿童村模式与香山慈幼院相同，规模却小得多：十家儿童村 30 年培养的孤贫儿童，估计还不到香山慈幼院在 30 年里培养的 6000 多孤贫儿童的一半。中国的孤贫儿童村不该叫“国际 SOS 儿童村”，而该叫“香山慈幼院分院”。网上资料显示，人大代表和香山慈幼院老校友多年呼吁将立新学校恢复原名香山慈幼院，至今未果。

如果互联网百年前就出现，一战、二战大概就打不起来，反右、大跃进、文



革等中国式的折腾也大概折腾不起来。科技发展也有恶果，如火药、枪炮、原子弹，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尽管也有负面效应，我认为正面效应远大于负面效应。

## 四、同学

本人没有上过幼儿园，初高中又一直住校，再加上小学阶段父母管教较严，放学时间不让到院子里玩，因此和西郊纺织大院的孩子们交往较少。除了小学的同班同学在大院中的四个男生（其中一人一直到初中还是同班，高中是同校不同班），其它好多大院的孩子都不认识。至于西郊纺织大院的女生，有一人和我是从小学到初中9年的同班同学，高中同校不同班。当年北京学校男女界限分明，同学12年几乎没说过话。

先说说小学同班的男生杨洪海，因患小儿麻痹症他从小腿瘸，外号杨瘸子（中国的社会风气从来不懂得尊重人，从小孩子起就有爱给人起外号的毛病，但我从来不用外号叫他）。他住在西郊纺织大院的24宿舍，我住在21宿舍。小学6年每天上下午两次上学（“困难时期”或称“自然灾害时期”，大概有两年时间老师说要劳逸结合，下午不上课），我要走过他的宿舍，一嗓子“杨洪海”，他就下来和我一起上学。我量了一下好搜地图，这段上学路为1.3公里；计算了一下，小学6年我们一起步行了约7000公里。24宿舍对面的15宿舍，是设计院职工的单身宿舍。大概60年左右，我妈妈找了住在那里的一个青年设计师教我和弟弟学习拉小提琴。杨洪海告诉我，他们每天是听我一声“呀呼嗨”（50年代有一首群众歌曲中有这一句）就准时醒来起床。小学毕业他上了另一所中学。文革前我们初中毕业，听说他未考高中而上了一所技校。文革后期毕业分配，他留北京进了工厂，成为我们所有必须上山下乡的高中生羡慕的对象。70年代后期我又听到了一个噩耗：他学会了开摩托，与人打赌在约定时间内开摩托到颐和园，他带着他的徒弟就上路了，结果出车祸去世，徒弟受了重伤。当时青年没有什么业余生活，部分人就去玩摩托；人们传说“坐汽车是铁包肉，开摩托是肉包铁”，“最初开摩托的人十有八九都车祸去世了”。我是相信这一说法的，因为到90年代，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因开摩托出车祸去世。他曾去延川插队，回京后在三元桥东的西门子公司工作。那天他接到首钢电话，报修西门子公司设备，他就开着摩托去维修，结果在阜成路上与一水泥搅拌车相撞受伤不治身亡。

下面谈谈西郊纺织大院那个与我同学12年没说过话的女生薛申。文革中她随父亲下放湖南邵阳二纺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后来到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图书馆系读研。1999年5月，薛申带着她刚上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儿子回国探亲。当时我的初高中同学均恢复了联系（包括女生），为迎接她回国，我们初中同学男生5人、女生6人在我家聚会。聚会时，我和薛申、陈淮子三人专门合影一张，因为我们是小学6年的同学，并且同是西郊纺织大院的子弟。我和陈淮子与薛申同学12年相互间说的话，可能没有这次聚会一天说的话多。“男女界限”，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封建社会千年老传统在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中小学的新说法。这是整个社会把男女关系、爱情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影响到中小学生的结果。那次聚合之后，她回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开始搞一个关于中国老三届的研究课题。2000年，她写信托我在国内帮她向清华附中同学发放及回收调查问卷，内容是关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以及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幸的是，薛申于2006年因病去世，不知她的课题完成没有。完全退休后我有了较多的时间，打算去了解一下。若她的课题没有完成，我想去继续完成它，因为我对这个课题也极感兴趣。

上面谈了西郊纺织大院我的6位小学同学中两位的情况，都是悲剧结尾。我们7人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我们自始至终同学6年，说明我们的家长在这6年内都没有调动。考虑1956—1962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和三年大饥荒，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在展一小的同班同学有不少是中途转学来的，也有不少中途转学走了。我们7人同学6年，除了偶然因素外，应该说必然因素是纺织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较为集中。这一时期中国纺织业处于大发展时期，设计纺织工厂的需求很迫切，使得我们的父母工作比较稳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少些。到了文革浩劫，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家长大多经历了下放、调动。到了70年代中期，全国四个大型化纤企业开始建设，纺织部设计院紧缺设计人员，于是1973—1974年，很多设计院的下放技术干部回到北京。而纺织部的机关干部，一般到1978—1979年才调回北京。■

## 【资 料】

编者按：此文作者不平（笔名），文革伊始，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三。其人特立独行，好学深思，1967年开始写随感，反对个人崇拜。1968年到崇明农场务农。继续读书写作，并自编《肥田集》一书。1972年5月12日晨，在上海人民广场贴出署有作者真实姓名、地址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随后，作者被公安审讯。关押三日后，由农场领回。1974年上调上海三航局，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上海师大，毕业留校任教。2003年出版《挑战毛泽东》（美国成家出版社）。以“不平”之名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六十余篇。

##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sup>1</sup>

不平<sup>2</sup>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马克思

真理越辩越明。

——谚语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本书，叫做《哲学问题解答》，是甘肃人民出版社58年出版的。书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真理是否有阶级性？”对于这个问题，书中的答案是这样的：

真理是无阶级性的。真理是客观的，没有主观真理。客观事物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对它有正确的反映，也有错误的反映。正确的反映就是真理。客观事物的阶级性并不受阶级的主观愿望的影响，不能说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真理。但是，客观的规律却决定着某些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进步的，落后的和将要灭亡的。正因为如此，真理观是有阶级性的。没落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sup>1</sup> 这篇大字报所批判的文字见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作者

<sup>2</sup> 此大字报当时贴出时用的是作者的本名，作者要求本刊以其后起的笔名“不平”刊发。——编者

抹杀真理，否认客观的规律，先进的阶级（现代是工人阶级）其本身的利益则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致的，它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必然胜利的。所以说真理是无阶级性的，而属于不同阶级的人对真理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脑海中就产生了问题：“真理果真是无阶级性的吗？”像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要叫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力不胜任的。于是我就去翻查文章，因为我明明记得有一篇文章中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查了很多文章，终于找到了这段主张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你们果真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去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

看了这两段文字，我的脑中顿时混乱起来，真理究竟是否有阶级性呢？看看这两段文字似乎都有道理，到底谁对谁错呢？

两个对立的观点，在我脑中激烈地斗争。我极力想使自己服从“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支持这个观点吧，这是不会错的。时时又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声音还告诉我：你应该进行独立思考。我越进行思考分析，越想使自己树立“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然而人的思想似乎也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也就越加错误。而对立的“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在我脑中也就树立得越牢固。

有了这种违背自己意志的思想，应该说是一种不幸罢。然而这能怨谁呢？只

能怪自己。第一是太爱想问题，只要我的脑子稍微麻木，迟钝那么一点儿，也就好了。第二，为什么别人想这个问题会得到和我相反的结论呢？这是由于自己和《哲学问题解答》的一些编者有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假若我能有和大家一样的思想方法，也就好了。

既然我犯了这两个错误，那当然只能自食其恶果了。现在就把我的看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分析、批判。以后当力求改正这两个错误，同时希望大家能避免这两个错误。

我也学习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了一些主席的著作。想看看我们的导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答的。这当然是说想少花些脑子，少花些力气，偷些懒罢了。然而我竟未能如愿。导师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导师的著作中，真理倒是出现了不少：真理论，永恒真理，绝对真理，客观真理，然而并没有谈到阶级真理。导师的著作中，真理的性质也谈到不少，实践性，相对性，客观性，然而并没有谈到阶级性。假若真理果真是有阶级性的，而导师们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竟然没有提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疏忽。

我又找了另外很多大小人物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真理这个词也出现了不止一次，可惜的是没有一次是和“阶级”连在一起的。对于真理的这一根本性质，竟会运用得如此的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文章的这一段文字，后半段应该是肯定的。然而这前半段和后半段就产生了矛盾，并且它的含义也显得混乱，模糊。既然真理是客观的，这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真理只有一个，阶级的真理又来自何方呢？

什么叫阶级的真理呢？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地球上没有人类的时候是如此，有人类而无阶级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了阶级存在的时候也是如此，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人们认为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是如此，人们中产生了两种意见，产生了争论也是如此，等到人们都接受了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观点，它仍然如此。请问这一条真理和“阶级”到底有什么搭界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难道说这个规律是无产阶级的规律，此外还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的规律？

毛主席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

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难道这只是一条无产阶级的真理，此外还存在一条资产阶级的真理？

假如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存在着无产阶级真理和资产阶级真理，那么谬论也该有阶级性了，还应该存在着无产阶级谬论和资产阶级谬论。

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坚持的真理，它便成了资产阶级真理。那么地主阶级坚持的真理当然就是地主阶级的真理。那么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个小资产阶级，岂不应该还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真理？按照阶级性的说法，天主教义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就成了真理了，上帝对于基督徒是存在的，活佛只存在于和尚的头上。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个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按劳分配主义。”按照这种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说法，所有这些全是真理，只不过是阶级性不同？

只要哪一个阶级认为这是真理，它就成为哪一个阶级的真理。那真是太简单了。只要我认为是真理的，它就成为我的真理。伽里略认为地球在围绕太阳转，这就成为伽里略的真理。只有达尔文是从猿人进化来的，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有鬼神，这就成为“很多人”的真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这时的真理就成了少数人的真理？

我们听到过很多以某人名字命名的××理论，××思想，××主义，××定理，从来不曾听到过××真理，想必现在要出现了，因为这是他所坚持的真理呀！

假如无产阶级认为的真理就成为无产阶级的真理，那么全人类一致公认的岂不成了全人类的真理？岂不成了超阶级的，绝对神圣的真理？那么伽里略以前太阳围着地球转岂不成了是超阶级的，绝对神圣的真理？

我们经常听到说某人在追求真理，某些人发现了真理。这倒使我奇怪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而每个人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那么他当然也应该有他本阶级的真理了，他还要去追求什么真理，发现什么真理呢？莫非他这个人是没有阶级性的，还要去追求真理？上帝不是很公平的吗？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一个阶级一个真理。

“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

那么资产阶级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无产阶级就非要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谬论之所以成为谬论，我们之所以要反对谬论，并不是因为它是“你们所坚持的‘真理’”，而是因为它不符合客观规律，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它是真理，或者因为它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有用的，而是因为它符合客观规律的。然而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同志硬是想不通。

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而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对于那些坚持真理有阶级性的同志，请再问一声：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客观真理呢？假如真理既存在着阶级性，又存在着客观性，那无产阶级真理等于不等于客观真理呢？在有些人看来，无产阶级坚持的真理就是客观规律，资产阶级坚持的“真理”，就是客观的谬论。所以你们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

这就涉及到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客观的实践，还是看它为那一个阶级所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社会的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断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靠主观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然而有些同志认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只要看它为哪个阶级所坚持。资产阶级坚持的，就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坚持的，就坚决拥护。在这些同志看来，根本不需要看社会的实践如何，或者看谁说得有理。他们只要知道谁是无产阶级就足够了。为什么他们要反对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呢？因为他们发觉这是资产阶级坚持的。

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这是真理吗？那岂不是说，真理必须依赖无产阶级，必须依赖于人类这个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大部分，必须依赖于主观？无产阶级所坚持的真理，要不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呢？真理是不是只要无产阶级坚持就行了呢？还是说要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假如说无产阶级所坚

持的真理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那检验出来会不会发现它的错误呢？如果没有这一可能性，那这一步岂不成了多余的？假如有可能发现它的不完全，它的错误，这时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混进无产阶级真理队伍的叛徒，内奸，工贼？实践的检验只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还是说无产阶级真理是绝对正确的，无产阶级一定要等到这一理论经过了“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的检验才承认它为真理？假如如此的话，那么在它还没有经过足够实践检验的时候，又是哪个阶级的真理呢？

按照这一观点，根本不需要经过实践的经验，只要征求一下广大的无产阶级：“这是真理吗？”不就行了吗？

伽里略说地球围着太阳转，那就问一下广大的无产阶级：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吗？假如回答是否定的，就说明这是资产阶级谬论？

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呢？那就要问广大的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说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那么这就是无产阶级真理（或资产阶级谬论，按某些同志的说法，这两者是等价的）。假如无产阶级回答说不知道呢？那，那，那……

然而马克思为什么要去研究社会呢？那时候不是已经产生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吗？他为什么不去征求广大的无产阶级呢？最简单的，只要来一个签名运动加上数字统计不就行了吗？

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以后，又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革命家进行宣传呢？宣传给无产阶级吗？把无产阶级坚持的真理宣传给无产阶级有什么意义呢？宣传给资产阶级吗？那就更没有意义了。让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吧。这是从一篇题为《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的文章中摘出来的。

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么宗教和偏见也就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论，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反不如这些谬论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论是绝对对立的。欲知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是看他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说得天花乱坠的，都只能把这当作谬



论看待。

无产阶级坚持的是否就一定是客观真理呢？杨成武的大树特树也没有看到哪一个无产阶级反对过，在高喊大树特树口号的人们中，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这大树特树到底是哪个阶级的真理呢？刘少奇的《修养》出来了，刘少奇拼命鼓吹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论，也没有看到哪一个无产阶级反对过；相反的，倒是看到过很多无产阶级说：我过去中了《修养》的流毒，中了奴隶主义的流毒。那么这到底是哪一个阶级的真理呢？莫非真理的阶级性还有着时间性？在文化革命以前，奴隶主义是无产阶级真理，文化革命以后就成了资产阶级真理？

对于你们的这种观点，对于你们的这段文字，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吧。这是从中共江西省写作小组的《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中摘出来的。

刘少奇赤裸裸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对’是有绝对性的，但在资产阶级的眼光中则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东西，所以绝对也是有条件的。”刘少奇妄图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为标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充分暴露了他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对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

这话当然不对。在阶级社会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那么在原始社会还没有产生阶级，这时候的真理就没有阶级性，就成为全人类的真理了？这时候有没有谬论呢？这时的谬论又是什么“××”的真理呢？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这时候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各人的思想仍然是不同的，各人坚持的真理仍然是有差异的。难道说这时候的真理还存在着先进落后性，还存在着先进人们的真理和落后人们的真理？

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有阶级的社会。那么在奴隶社会里，奴隶阶级的真理是什么？奴隶主阶级的真理是什么？这时有没有客观真理？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真理是什么？地主阶级的真理又是什么呢？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些工人和农民认为剥削是应该的，他有地我去种，自然要交地租；他办厂我去工作，自然要上交利润，只是觉得剥削太重。于是他们经常暴发要求减租减息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那么这一看法是哪一个阶级的真理呢？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会认为剥削是应该的吗？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他们会认为剥削太重吗？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当资产阶级带领着各个阶级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发起进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这时的无产阶级真理和资产阶级真理是如何的呢？

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是不是同时产生的？如果说无产阶级比马列主义先产生，那么在马列主义产生以前的无产阶级真理是什么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那么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真理又是什么呢？难道这时的中国的无产阶级真理和德国的、俄国的……无产阶级真理是不同的吗？一些不发达的接受马列主义较迟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发源地的无产阶级，其真理难道是不同的吗？苏联曾经是列宁亲手缔造的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什么呢？如今，苏联变修了，我们说，苏联的工人阶级正在觉醒。那么，在觉醒以前，那里的工人阶级的真理又是什么呢？无产阶级所坚持的真理，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是不是应该一样的？美国的苏联的无产阶级真理，难道不应该是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思想有一条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还不拿起枪杆子呢？

按照这种观点，只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从肉体上消灭了，就不存在地主阶级真理、资产阶级真理了。否则它们将依附到哪里去呢？这时候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于是也就只剩下工人阶级真理、农民阶级真理和工人阶级谬论、农民阶级谬论了。也许有人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家感到不高兴，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只剩下劳动人民真理和劳动人民的谬论了。

哲学的历史就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即使是唯物主义罢，还存在着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种种流派。所有这些都是哪些阶级的真理呢？李卓吾的理论是哪个阶级的真理呢？黑格尔哲学是哪个阶级的真理呢？费尔巴哈的哲学又是什么阶级的真理呢？圣西门、付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又是什么阶级的真理呢？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

山，他们的理论又到底是哪些阶级的真理呢？斯大林的著作中，据说也有部分是错误的理论，这些错误的理论又是什么阶级的真理呢？

你们以为只要抬出一个阶级性，问题就解决了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社会上，从古至今到处存在着争论，争论着哪一个观点是真理（他们以为是在争论着哪一个观点符合客观规律）。如今，幸亏了这些同志的指点，知道了这种说法是不严密的，是错误的，原来这些观点都是真理，只不过是阶级性不同。譬如关于真理有阶级性和真理无阶级性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知道了前者是无产阶级的真理而后者是资产阶级的真理，于是争论停止了。然而今后的社会中，人们中，无产阶级中，仍然存在着争论。这时人们将争论不同意见中哪一个是无产阶级真理。然而似乎没有人明知自己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真理还要把它抬出来，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真理。在争论中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真理，而且这双方中也没有看到哪一方是资产阶级，这时应该怎么办呢？看来应该说：“对于无产阶级真理，不同的人们（社会上有资格争论的人们），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真理，正是我要反对的——”看来真理面前只加上一个“无产阶级”的定语还不够，还应该再加上一个“纯粹的”或者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的”，然而这就够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所说的都是对的，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对”，真理确实是有阶级性的，那么请问：怎么知道这是无产阶级所坚持的真理呢？查查提出这个观点的人的阶级成份？如果他是无产阶级则这个观点无产阶级就该坚持，否则就该反对？“真理是无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真理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哲学问题解答》的作者（还是谁）是资产阶级从而知道的吗？

还是说要进行一次统计。刘少奇把他的《修养》说成是无产阶级真理，杨成武把他的“大树特树”说成是无产阶级真理，请问如何知道它们是无产阶级真理还是资产阶级真理？你们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真理，请问又是如何知道的？有多少无产阶级表示过他们支持这一观点？我在这里提出真理没有阶级性，你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真理，那么根据你们的统计，又有多少资产阶级支持这一观点，从而得出你们的这一无产阶级结论的呢？

还有什么更权威的方法能够判断某种理论是无产阶级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真理还是资产阶级所坚持的资产阶级谬论吗？还是说存在判断无产阶级真理还是

资产阶级真理的权威呢？

你们的错错在什么地方呢？你们说真理和谬论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标准。这只能说各个阶级真理的标准不同，怎么能得出结论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呢？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这和“阶级的标准”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真理是客观的，所以我们要进行讨论进行争论摆事实讲道理，看看谁的真理的标准（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从而抛弃错误的观点接受正确的观点。真理的标准难道能和真理混在一起谈吗？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是这样说的：“这里也和真理的标准没有什么关系。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行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

是说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承认的人的多少，承认的人的阶级成份为转移的，还是说真理必须得到无产阶级的承认才能成为真理，这就是本文准备辩清楚的。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管这人是什么阶级，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而这种所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论调（也许又要说，对于唯物主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标准）则说真理是由无产阶级决定的，真理必须依赖于无产阶级。还说是阶级决定意识，它说凡是无产阶级所坚持的就是真理，就要坚决拥护，凡是资产阶级所坚持的就是谬论，就要坚决反对。这当然也是唯心主义，只是应该在“心”的前面加一个定语：阶级，称之为：唯阶级之心主义。它实质上只是唯心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罢了。给这种现代唯心主义起一个名字，应该称为唯阶级论。它只不过说：阶级决定一切。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说：这块石头的存在是因为我的脚碰到了它。而唯阶级论者则说：这块石头的存在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它存在。

应该说，只存在着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客观的真理，从来不存在着依赖于人的，随着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观的真理。这又是一条没有阶级性的真理。

真理的发展规律，就是不断地被人们发现，在与谬论的斗争中逐步扩大自己的阵地。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

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这里还准备摘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从艾思奇同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摘出来的。

上面我们几次提到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在认识上的任务就是要我们正确地把握客观真理和避免错误，所以真理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专门的研究。哲学史上关于真理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第一，真理是否有客观性，即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第二，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给予肯定的回答：肯定真理是具有客观性的，肯定我们的认识能够把握客观真理，我们说真理具有客观性，就是说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内容。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指出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那么，它所反映的内容，自然是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之前，早就作为不依赖于主体或人类意识的客观实在而存在了。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的反映。要辨别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它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相符合；能够符合的就是真理，不能符合的就是错误。所以真理只能是客观真理，没有什么主观真理。

但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就是否认是非的客观标准，把是非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

主观唯心主义所虚构的这种真理观，同时也是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既然不承认真理有任何客观标准，也就自然而然地否认有任何绝对真理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真伪是非的标准既然是主观主义的，那就无异是说：“各人有各人的真理，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人对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对于自己来说都是真理。真理竟好像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是完全相对的，没有任何绝对性。中国明朝李卓吾是一个反对传统儒学，反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思想家，但他在真理问题上有着这种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很明显的思想因素……。胡适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更为露骨，他认为真理只是对于人“有用的假设”，认为它“有用”

到什么程度，就真到什么程度。如果真像实用主义者胡适所说的那样所谓“有用的假设”就是真理，那么，各人都可以对同一件事按照自己不同的利益作出不同的假设，并各自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真理”了。照这样说，那末，德国法西斯主义关于世界上只有雅利安人是唯一优秀人种的胡说，也算是“真理”了。美帝国主义把自己的侵略行为硬说成是自卫行为的滥调也算是“真理”了，因为这些对于他们都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这些唯心主义者的眼中，真理也根本没有任何绝对性，而是完全相对的。现在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所谓“多元”的真理观就是指这一种纯粹相对主义的观点。意思是说，真理不是一个，真理因人而异。因此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之下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以有许多个“真理”。这种所谓真理观的反动本质，它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否认有所谓的主观真理，因此也否认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即主张同一条件下的同一事物，因人因时而可以有不同真理的观点。凡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它之作为某种客观事物的某些过程或某些方面的情况的多少正确的反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加以承认，不能因人因时而有不同的。就这一点来说，凡是真理，都具有它的绝对性。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是“多元”的。自然，世界的反动派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是不肯承认的。他们硬要说他们的一套违反世界发展过程的谬论才是真理，但这只是说他们在主观上自以为那是真理，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谬论真的就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只是他们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人们把自己的认识主观地当做真理是一回事，他们的认识是否真的具有客观真理性又是一回事。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把这两回事混淆成一回事。把那些人们自以为是真理而实际上是谬论的认识也硬说成是真理，这就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错误来源。

从贝克莱、马赫主义者到当代的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都用不同的方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有用的，有效果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东西，就是真理。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既然工具本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就不是命题的特性了。工具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帝国主义的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说：“真理原是人造的，是为人而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

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中的这张纸，这支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可见实用主义者眼中的“真理”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要求，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具而已。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当然人们掌握了真理，能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们带来利益。不过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符合客观实际。决不能把凡是能够满足某些人主观需要的，对于某些人有用、有效果的、能带来利益的东西都叫做真理。投机家、冒险者、骗子手中的谎言和谬论，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效果，攫取到某些利益。但是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声称：“真理就是不断重复着的谎言。”这就一言道破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动哲学的腐朽性。主观真理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混淆真假颠倒是非，把知识、迷信、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宣扬蒙昧主义，以愚昧人心，强词夺理地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辩护的反动工具。

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有些唯心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取消真理的不可避免的逻辑结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真理不是个人承认的，而是社会上大多数承认的东西。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社会的全人类的经验形式”。所谓“社会的全人类的”词句是掩盖不住主观真理论的荒谬性的。太阳围绕地球转，偏见和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妖魔鬼怪等等邪说，曾经在一个时期比科学知识还普及得多，为社会一般人所公认。当然一种意见只要是真理，迟早一定会得到公众承认。但是还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无论怎样一种观点是否是真理，不能以承认的人们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多数人的承认或不承认，仍然是意识范围的事情。

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

艾思奇同志的文章和前面的一段文字，同样出现过两句话：“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但其内容之差异何其大也。请主张真理有阶级性的同志分析分析看，艾思奇同志的理论的阶级性究竟是如何。

文章应该说是写完了。首先是脑子太喜欢想。既然想到了，写写又有何妨？既然写出来了，让大家看看又有何妨？于是就想到发表。发表之后，对于那些“你们所坚持的真理，就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谬论”的同志来说，反驳这篇文章，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只是对他们反驳的方法提一点看法。希望他们也不必说什么观点、看法，发表长篇文章；也不要发火，发火容易伤身体。希望他们进行一下实地调查，能列举一些统计数字，例如某商店，某工厂，某城市，某省有多少无产阶级是主张真理有阶级性的，占比例多少，是否百分之百？又有多少资产阶级是主张真理是无阶级性的，占比例多少？后者如果不能做到就作罢。否则，即使你说了很多的道理，我知道你说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还是资产阶级的道理？即使你说你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真理，我不知道有多少无产阶级承认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讲话。

假如你们的统计数字确实能证明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是一条无产阶级真理，那么本人就心服了，就宣布投降。

如果这篇文章能遭到两个小人物的文章的同等待遇或是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的相反待遇，那将是作者不敢妄想的。■

#### 【资 料】

###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严禁私自翻印

### 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最近，发现有些单位和个人私自翻印、出售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照片（包括一些生活照片）和作品，严重地违背了党纪国法。对于这些利用翻印和出售毛主席照片和作品进行非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加追究。



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领袖。印刷、发表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决不能擅自行事，更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因此，中央决定：不论个人或集体像，未经中央审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业已通知过，现在再通知一次，望你们按此通知严格监督执行。■

注：以上资料全文按原件录自1967年10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印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第303页至第304页。

### 【资 料】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 关于给公安系统选调复员战士问题的批示

为了加强和改造全国的公安机关，同意从解放军复员的战士中，选调一批好的复员战士到公安机关工作。这批复员战士在解放军中经过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他们中间有很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连续几年的五好战士，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三支”“两军”的考验，他们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无产阶级感情更加深厚，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有了显著提高。他们到公安战线工作，对于加强和改造公安机关具有重大意义。公安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应当热烈欢迎，坚决支持，虚心学习，热情帮助。调到公安部门工作的革命战士，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希望你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彻底肃清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把公安机关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发〔68〕59号

注：此文录自1969年6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选编》第三集（1968年4月至1969年5月）第199页至第200页。

（以上两份资料系吴铭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 【读者来信】

## 1. 许绍英提醒《记忆》注意学术规范

贵刊第128期的《“狼奶”讨论》附录一，马昌海先生撰写的《农村耕地占有率问题》一文，有一处引用了金陵大学农经系J·L·Buck教授（他的中文名字叫卜凯）写的《中国的土地利用》一书中的文字，但马先生引用的不是原文。卜凯的原文是：“其私有土地之部分，大量为单独地主所有，并租与农民，乃成为中国之一重要问题，然其面积有时估计过高。农民自有之农地称不及 $\frac{4}{3}$ ，租入者超过 $\frac{1}{4}$ 。小麦地带有自有农地较为普遍，占 $\frac{7}{8}$ ，而水稻地带占 $\frac{3}{5}$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出版，1941年，第236页）马先生的引的是：“有些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这一引文意思与卜凯的大致不错，但不是卜凯的原文。估计是马先生从别处转引的，遗憾的是，马先生没有注明转引的出处。严格地讲，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同样的问题还有一处。在上述引文的后面，马先生又引了卜凯的话：“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这段话虽然也出自卜凯的同一书的同一页，但其原文是：“各种田产权农民所占比例，为衡量租佃制度范围之另一方法。自耕农占农民半数以上，半自耕农不及 $\frac{1}{3}$ ，佃农仅占17%。”

拜读马先生诸文，深自钦佩，其所论多获我心。上述区区两例，白璧微瑕耳。唯因以前读过《示读者以大信》一书，其首篇即贵刊主编启之先生重建学术规范之大文。受惠贵刊八载，无寸尺之功，有求疵之嫌。如蒙厚谅，谨盼将此献芹之函，容于贵刊之一角。

2015-7-13

## 2. 胡泊纠错

贵刊135期有如下误植：

1、张俊祥——张【骏】祥。

2、认为此书竟胡说八道——认为此书【净】胡说八道。

另，有一处值得商榷：1951年电影《荣誉属于谁》挨批，孟犁野称和毛察觉高岗反党活动有关，令人费解。高岗当时有何反党活动？何况时值朝鲜战争，高经营东北得力，对后勤贡献巨大，圣眷正隆，何觉察之有？

### 3. 周元龄纠错

《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文中有个小纰漏。贵刊第三页倒数第五行：据江青最后的一位护士说，就在毛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

可能这个护士记忆有误，毛是1976年9月9日去世的，江青是1976年9月2日被中央从山西大寨叫回北京，不在小靳庄。

### 4. 张晓良谈《纪念白求恩》及陈仁德咏江青诗

读135期阎长贵文，方知白求恩曾撰文提及江青。联想到毛泽东，连这么一位重要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年龄都搞错了——《纪念白求恩》开篇即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白求恩1890年生，1939年病逝，还不到五十岁。

江青自缢，重庆诗人陈仁德作诗两首：

其一：结帮组阁亦传奇，横扫三军将帅旗。十载威风成底事，斗篷换取有囚衣。

其二：临死如何万念灰？女皇意气唤难回。怜她旷代红“旗手”，竟尔今朝白骨堆。

7月19日

### 5. 蒋健置疑

江青为什么说嘉宝“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嘉宝生卒时间是1905年9月18日—1990年4月15日，明明是20世纪的人物。

## 6. 安徽大学教师李嘉树征集安徽文革史料

各位师友：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现在安徽大学任教。我正在研究安徽当代史，尤倾心于安徽文革史。目前，已收集到《安徽八二七》、《红旗报》，还访问了梁守福、凌恩荣等群众组织负责人。我收集到的资料还很有限，对历史的研究有待深入。（如我对首都三司驻皖联络站的详情就不太了解）兹借《记忆》一角，广为求助——如您手中有，或知道别人有与安徽文革相关的史料，谨请告之，不胜感谢。

我的联系方式：

信箱：jiashu95@163.com

手机：18605510635

恭祝夏安！

嘉树 谨拜

2015 年 7 月 17 日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